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ying xiang zhong guo jin dai shi de ming zhu

李大钊

平民主义

罗炳良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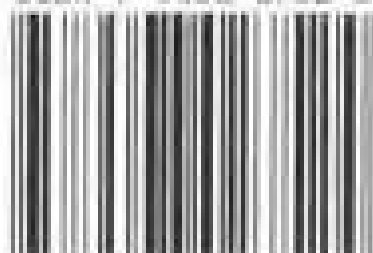
Li da qun ping min zhu yi



华夏出版社

《平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撰写的一部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要著作。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作者把农民反抗地主、工人反抗资本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斗争称为平民主义运动，同时又把资产阶级的“平民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明确区别开来，认为无产阶级“平民主义”的基础是工人政治，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前途是实现社会主义。本书所阐述的思想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有本质区别，奠定了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ISBN 7-5080-2752-3



9 787508 027524 >

ISBN 7-5080-2752-3

定价：10.00元

影 响 中 国 近 代 史 的 名 著

罗椿良 主编

平民主义

李大钊 著
刘建国 评注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主义/李大钊著;刘建国评注.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5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罗炳良主编)

ISBN 7 - 5080 - 2752 - 3

I. 平… II. ①李… ②刘… III. 新民主主义革命 - 革命
理论 IV. D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7293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本 5.875印张 80千字 3插页

2002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 | | |
|-----------|--------|
| 《四洲志》 | 林则徐 著 |
| 《劝学篇》 | 张之洞 著 |
| 《天演论》 | 严 复 译著 |
| 《盛世危言》 | 郑观应 著 |
| 《大同书》 | 康有为 著 |
| 《变法通议》 | 梁启超 著 |
| 《仁学》 | 谭嗣同 著 |
| 《革命军》 | 邹 容 著 |
| 《猛回头·警世钟》 | 陈天华 著 |
| 《虺书》 | 章炳麟 著 |
| 《建国方略》 | 孙中山 著 |
| 《平民主义》 | 李大钊 著 |

责任编辑：牛彤 友葵 装帧设计：张辰



李大钊



民国十二年(1923年)
商务印书馆印本《平民主义》封面

总序

罗炳良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个特定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著作，人们习惯于把这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称之为名著。历代名著以其丰富的内涵、睿智的思想和深刻的启示，不但给世人提供了行为龟鉴，而且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惟其如此，关于名著的汇编与刊刻，历代层出不穷，成为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仅以20世纪为例，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名著丛刊”，影响颇大。从50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又组织翻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无与伦比。90年代末，河北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国人对于名著的浓厚兴趣和价值认同。21世纪伊始，华夏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丛书，遴选12种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撰写或翻译的学术名著加以评注、整理出版。这不仅是继承前贤事业的总结性工作，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又将成为学术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谓具有双重的意义。



谈到学术名著，在一般的文献目录书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分类和确切的定义。但是，由于世人长期约定俗成地广泛使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评价标准。我认为，名著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时代的特征。优秀的学术名著大多能够站在时代潮流之上，揭示当时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反映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境界与精神风貌。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就可以看出这些名著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作者的思想动机，发掘出名著蕴涵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

（一）名著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津梁。关注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评价学术名著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重视学术名著的归宿。研读历代学术名著，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有助于世人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社会历史演变的规律，增强自身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投身于社会历史运动，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活动，为现实社会服务，把人类社会纳入良性发展和理性运转的轨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非常注重考察社会的变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揭示学术名著的时代价值。先秦时期的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一统天下的历史被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大国争霸的局面所代替，因而颂扬夏、商、周王朝功业的《诗经》也就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记载诸侯国历史的《春秋》。在孟子看来，《诗经》代表三代王朝兴盛统一的时代，而《春秋》则代表诸侯争霸的分裂割据时代。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名著的产生受时代的激荡，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历史的演变及其特征，直接影响着《诗经》与《春秋》的盛衰兴替；二是人们从名著的盛衰消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历史的演变，区分历史发展阶段，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史记》，是一部藏之名山、流韵千古的学术名著。司马谈极为重视时代发展与学术事业的关系，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司马迁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既讲到从春秋末年诸侯割据到汉朝统一的时代变迁，又强调学者应该把这一历史变革及时记载下来，把握住历史发展的脉络。司马迁继承父亲的史学意识，以揭示社会历史演变为己任，郑重地说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他把自己撰述历史的事业和周公制《礼》《乐》，孔子修《春秋》联系起来，既表现出深邃的历史感，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所以《史记》能够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名著，决非偶然。汉代以后，历代学者认识到名著是居今识古和引古筹今的载体，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名著的社会价值。南朝刘勰撰《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思是说，人类社会的产生，在后世看来乃是非常遥远的事；而人类历史又是一次而过，不具有重复性。后人要想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只能借助于前人的文献记录；一旦离开文献记载，历史的真相也就渺茫难稽。唐朝建立以后，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叶空前统一的强大皇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们时时以隋朝短祚为借鉴，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李世民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贞观政要·任贤》）。即把前人的行事当作一面镜子，既能看到历史上朝代的兴亡、政权的更替，又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参照，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从亲身经历的政治生涯中认识到史籍的重要性，大力提倡修撰前代史书。他在《修晋书诏》中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纛，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史论事，历兹未远。发挥

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强调后人居今识古的途径，只有通过史学名著去认识历史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史籍作为沟通历史与现实纽带的作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四）。以自觉意识著书立说，做天下有用的学问，撰写出《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他认识到要想写出名著，就必须戒除治学浮躁、心存侥幸、急功近利等不良作风，必须做扎实的学问，这样的著作才有学术价值，才能对社会发挥作用。

在今天看来，学者居今识古，是为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而引古筹今，则是要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应用到现实社会，古为今用。如果离开历代名著（当然不仅仅限于名著），这两个目标都将无法实现；而恰恰是名著的存在，搭起了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桥梁。

（二）名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飞跃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翼并进。经过时间长河大浪淘沙洗礼而流传下来的历代名著，无疑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名著中蕴涵着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而最有价值的是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成一种

崇高的爱国情感，超越了特定的时代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代优秀的学术著作，都能够反映出作者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极为关注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通过记载社会历史的治乱盛衰、学术思想的得失利弊、人民生活的贫富苦乐，反映出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这种关心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成为历代学者致力于撰述政论和学术著作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历来存在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意识。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孔子修《春秋》是在礼崩乐坏、世道衰微的社会局面下，具有一种试图拨乱世而反之正的忧患意识。而《春秋》这部名著一经产生，就发挥了让乱臣贼子心存戒惧而不敢犯上作乱的社会作用。到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使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突出。范仲淹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他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卷七）。这种忧国忧民的

意识使《岳阳楼记》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清代龚自珍的忧患意识也很突出，特别强调“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阐明史学名著具有增强世人忧国忧民意识、陶冶爱国主义情操和教育世人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价值。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学者们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魏源撰《海国图志》，明确认识到要抵御外侮，必须学习外国长技，富国强兵。他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原叙》）。这是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回答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环伺中国，边疆事务日渐孔亟。这一时期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逐渐增多，产生出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和姚莹《康輶纪行》等名著。以何秋涛研究边疆问题为例，主要着眼于中俄关系。他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英、法、德、美等国有隔海之遥，而沙俄与中国接壤，势必成为最大的威胁。他说：“我朝边境接壤俄罗斯，几及万里。康熙年间设界碑于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诸地，此北徼界碑之始；钦定大臣至尼布楚会议，定约七条，此北徼条例之始；雍正年间，设卡伦于忽伦贝尔及楚库河诸地，此北徼卡伦之始。皆宜详考，以备掌故。”（《朔方备乘·凡例》）。作者以极其深刻的边疆危机忧患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意识考察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目的在于为清廷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依据和借鉴。果然，此书撰成后墨迹未干，沙俄就通过《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样惨痛的事实，更加衬托出这部名著的远见卓识和爱国主义思想。进入 20 世纪，名家辈出，名著更加丰富。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人，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情节寓含在著述之中。陈垣在日伪占领下的北平拒不与敌人合作，阐扬历史上爱国志士的民族气节，撰《通鉴胡注表微》，成为现代史上的一部名著。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忧患意识与爱国思想更加鲜明。郭沫若在“风雨如晦”之际、“鸡鸣不已”之时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了民族的出路研究历史。他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他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史稿》，与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撰写的一大批史学著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今天我们研读历代名著，可以继承和发扬先辈的

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全社会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传统的教育，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沟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统一，使中华民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三）名著是每一个社会公民增益历史智慧的源泉。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整个社会中每一个公民文化素养的程度。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我一直认为，要培养全社会的人文素质，首先应当重视哲学教育和史学教育。哲学可以培养人从现实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而史学则可以培养人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因为小自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规划，大到国家施政方针的制订，都不外乎两个依据，一个是以现实社会客观形势发展为依据，另一个则是以历史过程演变为依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说社会实践是个人和社会增益现实智慧的源泉，那么历代名著则是个人和社会增益历史智慧的源泉。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认识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绳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就是说，生活在现代的人之所以要认识古人的所作所为，目的是要给自己找到一面镜子，汲取古人的智慧。但是，由于各个时代古人的行事各不

相同，对于历史上人们实行的一些制度和古人的做法，后人又不能像镜子一样完全模仿、照搬。因为古人的各项制度都是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哪怕是最完美的制度，由于时代的不同，也不可能完全适应于后世发展变化了的社会形势。所以后人只能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智慧，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好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深刻地总结出从名著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方法。他说：“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跻，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箱篋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乃若《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披，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我们从刘知几所谓“世无竹帛”和“竹帛长存”两种情况所造成的不同结局，可以清楚地看到史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后人阅读史籍可以达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自省的效果，使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名著而发挥启迪和教育功能，增益人们的历史智慧。第二，汲取历史智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

国家，都是不可或缺财富，是人生修养的当务之急和治理国家的至要之道。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对名著的价值作了全面论述，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借鉴历史智慧的杰作。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强调史学名著可以起到借鉴作用，指出不具备供人借鉴功能的史书没有价值。他进而又阐述借鉴古人经验教训的重要性：“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辩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读通鉴论·绪论四》）。如果不懂得汲取古人智慧，即使名著读得再多，也会毫无所得，入宝山而空归。接着他进一步论述借鉴历史的方法，认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读通鉴论·绪论四》）。历史借鉴决不同于镜子照映物体，必须通过历史认识主体的内心认知活动来实现。所以他指出：“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已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

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绪论四》）。也就是说，后人必须具备借鉴历史的意识和方法，才能够在历代名著中汲取智慧，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投身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从而使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提高。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尤其需要高素质的建设人才。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其文化修养和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个人或社会就愈益成熟。人类社会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历史的性质。离开了历史，个人与社会都会迷失方向。人类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当中，才能清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明确现实行动的准则。全社会现代化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历史智慧的应用。任何一个公民乃至整个社会，只有通过研读历代名著汲取前人创造的全部学术精华，明确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界限，才能不断提高个人文化素养和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创造出具有民族传统和现代特征的新型文化，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

二

众所周知，一定的社会条件创造出一定的学术思

想，历代名著都是各个时代社会历史的产物，因而社会历史的演变必然影响名著的面貌、特征与内容的变化。然而学术对于社会的反映又不是被动的，名著一经产生，就成为社会精神产品的一部分，必然会对社会产生能动的作用。这表明，名著既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这是我们把握学术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认识和评价名著的标准。

按照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中国近代社会的上限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界标，下限以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为界标，涵盖了80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段中，通过救亡图存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通过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迈向近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每当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都有一批先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自觉的意识撰写出一批名著；而这些名著因为关注与反映社会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大都能够揭示出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激励着当时和后来人们的行为，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综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与近代名著的互动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富国强兵。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国家，尽管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但仍以泱泱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版图之上。1840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充分暴露了清

朝统治的衰弱和腐朽。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士绅认识到，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传统的治国措施和伦理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外国力对比悬殊，使他们对西方国家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认为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国家。于是他们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内容的富国强兵运动，发展近代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史称“洋务运动”。反映这个阶段历史有代表性的名著主要有三部：一是林则徐的《四洲志》。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正确看待西方国家和学习西方国家的人是林则徐，被后人誉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为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让手下幕僚把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翻译出来，亲自加以润色、编辑，写成《四洲志》一书。本书简要叙述世界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当时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在林则徐的影响下，产生出一批研究外国史地的著作，此书实为开风气之先的创举。本书的编印和传播，在万马齐喑、固步自封的清代学界犹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开始扭转中国封建士大夫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蛮夷的愚昧无知观念。二是张之洞的《劝学篇》。作

为洋务运动主将之一的张之洞，对中西文化优劣作了比照，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他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辅，既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又能使国家实力富强，谋求与西方强国的平等地位。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清朝封建士大夫中开明派的思想，既反对顽固派官僚死守祖宗家法、盲目排外的做法，又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主张维护皇权专制制度，不求政治改革，仅仅采用西方国家的近代科技成果，引进洋枪洋炮、军舰轮船，加强清朝对内镇压和抵御外侮的国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世纪50至60年代出现了洋务运动的高潮，清朝兴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建立了近代陆军和海军，成为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三是严复的《天演论》。严复翻译英人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前两章，取名《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思想，把西方历史进化观念传播到中国。古代中国流行的思想是历史退化观念，上古三代是儒家理想的黄金时代，后世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自西方进化观念传入中国以后，全社会才逐渐形成后世胜过前代，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观念。《天演论》教育了近代一批批学者用进化观点观察社会，分析和解决问题，影响历史至深至远。

第二阶段，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变法维新。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中国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程度。随着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清廷洋务派惨淡经营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严酷的现实逼使近代爱国志士进一步反思，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国家工业和军事技术之皮毛，不对已经僵化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加以改革，并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个阶段反映这种思想逐步深化的名著有四部：一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清代买办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兴办洋务的实践中洞悉洋务派近代军事工业的内幕，朝廷巧取豪夺，大肆搜刮；各级官僚营私舞弊，侵吞公款；任人唯亲，弄虚作假等等，弊端百出。他主张变革朝政，开设议院，兴办新学，设立商部，主张以“商战”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侵略。郑观应的主张代表了我国最早一批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唤醒了更多官僚士大夫萌生改良政治的愿望，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二是康有为的《大同书》。随着中国近代内忧外患加剧，国内要求改革朝政的呼声日渐高涨，早期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成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撰《大同书》，较早阐述了变法维新观念。他以中国古代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公羊三世说为基础，把传统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说与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进化论结合起来，设计出人类社会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再由升平世进入太

平世，从而实现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他把人类社会历史描绘成这样一幅蓝图与前景，目的在于宣扬渐变学说，逐步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维新主张。三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宣传与组织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变法通议》是一部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集，由10余篇论文汇集而成，主要宗旨是以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阐明社会演变乃古今之公理，国家变则兴，不变则亡。变法目的是为保国、保种、保教，变法内容为兴学校、废科举、改官制、行立宪，要求清廷学习西方，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免遭各国列强瓜分豆剖之厄运。梁启超的文章先在《清议报》和《时务报》发表，语言生动，文字流畅，为人传诵一时，成为维新变法时期最有影响的代表著作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四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期抨击旧政、宣传变法的激进派人物，为反对封建专制、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而贡献出宝贵生命。他所著的《仁学》一书，提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批判封建制度、纲常名教，宣扬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上下相通、废除不仁的理想社会。他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由变法维新到暴力革命转变的契机，带动了许多民主志士放弃改良主义幻想，走上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新征途。

第三阶段，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共和制度。戊戌变法失败，使人们进一步认清皇权专制政治的本质；而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秩序完全确立起来。严峻的内忧外患局面，使变法改良派人士彻底清醒，除极少数人堕落为保皇派以外，绝大多数人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萌生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他们认为改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极端腐朽的专制统治下，没有生存的土壤。只有推翻君主制度，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才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中国危机。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宣传革命的著作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其代表著作主要有四部：一是邹容的《革命军》。本书以宣传革命为主题，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与民主；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方案，主要内容是组建民主政府、设立议会制度、制订和实行宪法。本书篇幅不大，出版后各地争相传阅，出现各种翻印本，影响非常之大。二是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部书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宣扬种族革命，号召国人起来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汉族人执政的民主国家。作者认为，清代朝廷已经是洋人统治中国的代理工具，根本无力维护中国独立与民族生存。要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首先要推翻清朝

政权，然后才能谋求民族自立和国家富强。由于两书分别以弹词和白话形式写成，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宣传革命道理，流传甚广，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有利地促进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三是章炳麟的《尙书》。章炳麟一生思想几经转变，所以这部书的内容也两度重新编订。《尙书》初刻本思想倾向尊君改良，颂扬清帝；内容包括议政变法，损益改制等；其封面由变法派主将梁启超题署。重订本《尙书》修正了初刻本宣扬的改良思想，转变为宣传革命，富有激烈的排满言论和反清思想，适应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既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民主共和制度的建设者。他在临时大总统任内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形式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固定下来，在我国近代民主化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所撰写的《建国方略》，首次为中国描绘出一幅全面而系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蓝图。从此以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皇权专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第四阶段，向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这一胜利果实却被代表新型封建官僚利益

的袁世凯所篡夺，中国并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国家。这种状况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能夺取政权，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不能掌握和建设政权。这样一来，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中国的希望，决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最终探索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李大钊著《平民主义》，可以作为这方面较早的代表性著作。李大钊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公开宣称自己开始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稍后又撰写《平民主义》一书，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阐明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劳农结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平民政权，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方向，真正寻到救国救民之路，标志着一个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崭新时代的到来。

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我们遴选的12部名著，反映出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历程，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主旋律中最强劲的音符，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名著所蕴涵的思想精华，一是深刻的救亡图强的

民族危机意识，二是鲜明的变革社会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三是崇高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近代历史上这些优秀遗产，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时间范围，升华为中华民族永久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献身于民族富强和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近代的名著影响近代历史最为显著的价值。当然，这些名著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洋务派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时，为论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把西方近代一切先进的科学与制度统统说成是中国古代圣贤制度的绪余，打出不是要用夷变夏，而是恢复上古圣贤道统的旗帜，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妥协性。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民族主义，没有把外国帝国主义与满洲政权明确区分开来，民族革命的内涵不甚清晰，因过于激烈的排满情绪而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不但削弱了联合满族人民一致反抗外国侵略的阵线，而且对汉族内部阴谋篡权的野心家认识不足，疏于防范，以致葬送了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在阅读这套名著时，应当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给予实事求是的对待和评价。

三

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著作思想之深刻、数量之众多、影响之深远，为我国古代社会所无法企及。我们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这次遴选近代名著的标准，一是注重开风气之先的著作，二是注重具有思想层面的著作。至于其他的名著，我们准备留待将来评注出版，争取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继续下去。以上遴选的12种名著，有些著作被收入作者的专集或全集，学术界业已做了标点整理工作。如《天演论》收入《严复集》（中华书局），《盛世危言》收入《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劝学篇》收入《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仁学》收入《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革命军》收入《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猛回头》和《警世钟》收入《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炫书》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建国方略》收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平民主义》收入《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等等。有些著作目前已有人做过评介和注释工作，如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谢俊美主编的“醒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等等。这些成果给我们的评注和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条件，成为我们工作的起点。有继承才有发展和创新，倘若没有这些成果做基础，就没有进一步前进和提高的阶梯，我们的评注和整理工作也就不可能深入，质量无法提高。

目前这套丛书与前面已有的评注和整理成果相比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过去评介与注释名著大多

重在字词的标音释义与成语典故的注释，其实这些内容凡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都能在相关的工具书上查到。这样做看起来好象方便了读者，而实际上是助长了一些年轻人不愿亲自动手查阅工具书的懒惰习惯。这次评注则重在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和旧名今译。关于历史人物，对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名人如孔子、司马迁、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孙中山、陈独秀等，一般不再注释，主要注释那些专业性比较强，广大读者难于检索的人，而重点注释那些称呼郡望、封爵、谥号、别字的人，如宣尼、韩昌黎、朱晦翁、于忠肃等等，凡属此类，虽名人亦出注。近代学者对某些外国人名、地名的称呼，今天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用现在通行的称呼注释，读者将无法理解，所以这方面内容是我们重点注释的对象，成为评注这套名著的最大特色。当然，这项工作难度较大，我们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只有尽最大努力，给后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铺平一些道路。二是评注和整理了某些前人未曾整理或较少涉及的名著，如林则徐《四洲志》、梁启超《变法通议》、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和《警世钟》、李大钊《平民主义》等等，或是首次单独整理评注出版，或是建国以后没有标点整理的单行版本。这对阐扬这些名著的价值，方便广大读者索书阅读，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三是对注释的名著写出《评介》和著者《评传》。《评介》可以帮助读

者认识每一部名著写作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学术价值、历史地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了解版本流传情况，从而更好地理解名著的思想。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我们根据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原则，增写了名著作者《评传》，以便了解作者所处的环境和时势，进一步增进对名著精髓的理解。正文与注释、评介与评传相互配合，不仅使这套丛书体例完备，而且使其内涵相得益彰，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比较显著的社会意义。四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注疏和整理更加完善。这次整理，对子原著的俗体字、异体字和繁体字，一律改为通用字和简体字；而原书大量的双行加注小字也不符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一律改为正文字体，并加括号，与正文相区别。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无论前人抄录或刊刻的古籍，还是今人点校出版的古籍，都无法避免鲁鱼亥豕的错误。文字有误，势必造成读者理解错误。诚如乾嘉学者戴震所说：“有一字非其底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戴东原集·与某书》）。结果必然造成对前贤思想或历史事实的误解，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例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解放后已经出过几个整理版本，其中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夏东元先生标点整理的《郑观应集》本成就最高。《郑观应集》本《盛世危言·原君》有“神农憔悴，尧瘦矐，舜黧

黑，禹胼胝”一句，赞誉古代圣贤勤民劬劳。然而“尧瘦曜”一句不可理解，而通行的工具书里也找不到“曜”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评注本则改作“尧瘦曜”。但是“曜”字为“明亮”、“光耀”之意，不仅不能与“瘦”字组合成词，而且与作者表达的含义恰恰南辕北辙。经查阅光绪庚子（1900年）侍鹤斋重印本《盛世危言》，得知“曜”字乃“臞”字之误。“臞”同“羸”，意为“瘦弱”，正符合作者原意。据此可知“尧瘦曜”一句乃为“尧瘦臞”之误。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或系出于校对疏忽所致误，中州古籍出版社本则是沿讹妄改而愈误。又如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体注释本《天演论》卷上《导言十六》正文“持今日之英伦，以与图德之朝相较”之后，有一段夹注小字：“自理（查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白（伊利莎白），是为图德之代。”按《天演论》各本夹注均作“自显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日，是为图德之代”。商务简体本把原文“额勒查日”改为“额勒查白”，是其校勘成绩。额勒查白现在通译伊丽莎白（1533—1603），英国都铎王朝末代女王（1558—1603）。但把“显理第七”径改为“查理第七”，显然失误。因为显理第七现在通译亨利七世（1457—1509），是建立都铎王朝的国王（1485—1509），正与原文意合。而查理第七现在通译查理七世（1403—1461），为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422—1461），与英国图德之朝（今译都

铎王朝，1485—1603）风马牛不相及。再如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演论》卷下《论一·能实》有“今夫策两荚以为郭，一房而数子，瞽然不盈箬之物也”一句，“策”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查1931年“严译名著丛刊”本《天演论》，该句为“今夫筴两荚以为郭，一房而数子，瞽然不盈箬之物也”，得知“策”字系由“筴”字简化而来。又上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慎始基斋原刻本，也作“筴”字。后经核对赫胥黎原著，始悟“筴”字乃是“莢”字之误刻。“筴”的异体字为“策”，而“莢”的简体字为“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豆荚由两片荚皮包裹，每个荚角只有几粒子，看上去不满一捧。通过这样校勘，终于文通字顺，语意始明。这次整理名著，评注者通过多种版本校勘，发现并订正了以上几处错误。举一反三而窥全豹，其余名著各种版本在刊刻、校雠、注释方面出现的错误，评注者也都做了订正，这里不再一一胪举。当然，这样说决不是要贬低他人成绩，抬高自己水平。我始终遵循前贤钱大昕的治学宗旨：“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畸訾前人，实以开导后学。”（《廿二史考异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任何人的注释中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舛误。只有本着护惜前人、嘉惠后学的态度治学，才能保证学术事业不断发展，促进我国的学术文化研究走向繁荣。

总序

主编这样重要的一套学术名著，我深深地感到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幸的是注释和评介这套丛书的十余位同志，都是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或中国通史学习、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尽管每个人对注释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每部名著评介的文风也会因人而异，但大家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从而保证了丛书整体水平。老友刘悦斌教授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从中赞襄擘画，增益我所不逮；师兄徐松巍教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时常往复讨论，匡正我之疏漏；北京师范大学古籍善本书库田斌老师热心提供善本，对我校虽给予方便。他们的盛情帮助和热心支持，推进了丛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至于整套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留下的许多遗憾，我不敢辞其咎。知我罪我，尚待读者评判。弁言简端，羞为书序！

2002年1月31日作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目 录

总 序	罗炳良 (1)
《平民主义》评介	刘建国 (3)

平民主义

一 “平民主义”的潮流	(13)
二 “平民主义”字义的解释	(15)
三 “平民主义”与强力	(19)
四 “平民主义”与“多数政治”	(23)
五 “平民主义”与解放及联治	(29)
六 “平民主义”与国际运动	(37)
七 “平民主义”的开端	(45)
八 总结	(53)

附录：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评介	刘建国 (57)
李大钊评传	刘建国 (135)

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评介

刘建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制定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方针。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非常剧烈。1921年底至1922年初，美国为遏止日本在中国的势力，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确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形成了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列强操纵下，中国国内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了多次大规模战争。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切都表明：中共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把中国人民从外国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民主共和

国。这一切也表明：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敌人还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按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不能完成中国人民当时面临的革命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目标，中共需要重新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无疑是符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情况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但是，如何完成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在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中，革命的前途、任务是什么；革命政权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等问题，许多人还不明白，甚至有的人根本就不理解。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二大”会议的精神，特别是为了使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理解和执行党的“最低纲领”，李大钊于1923年1

月16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半月刊》上发表了署名为李守常的文章——《平民主义》，该文对“平民主义”问题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反映在《平民主义》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李大钊认为，“平民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他把一切追求解放、摆脱封建压迫的运动都看作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例如封建国家要求解放，农民反抗地主，工人反抗资本家，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等等都是平民主义运动的表现。他特别注重妇女解放在实现平民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认为“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李大钊把实现妇女的解放当做实现平民主义的开端。第二，李大钊认为平民主义同帝国主义形同水火，互不相容。他说：“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帝国主义即存在一天，在帝国主义冲突轧轹之间，一切反对战争的企图，都是泡影，一切的国际会议，都不过是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处分弱小民族权力分配的机关罢了。”因此，李大钊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前提下，不可能有平民主义的存在。李大钊主张建立“平民主义”的大联合，以“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三，李大钊在《平民主

义》一文中非常重视“联邦制”的实行。他认为“联邦制”是平民主义的一种较好的形式，主张用“联邦主义”推动“平民主义”的实现。李大钊认为：“没有联邦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平民政治，必不能成功。有了联邦的组织，那时的平民政治就像有了导师一般。”第四，李大钊认为：“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密切相连的。“平民主义”是有阶级内容的，有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有资产阶级的“平民主义”，而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就是“工人政治”。工人政治就是社会主义。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人政治”，“的确含有统治（Rule）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的规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便自然的实现”；“工人政治完全实现时，用于阶级制度的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完成，它的统治意义将渐渐消灭，以事物管理代替人身的统治，这样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才是纯正的平民主义”。这种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

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由以上内容可知，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已不同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主义，它的发展前景是社会主义。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尽管同旧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本质的区别，但它仍带有新思想产生的幼稚病。首先，他的“平民主义”思想还没有同旧民主主义完全划清界限。他还不能把产生在欧洲、日本的“平民主义”思想同发生在俄国的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平民主义”相区别，有时甚至认为三者相同。其次，李大钊的平民主义还受到了欧洲及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认为在“平民主义”政治下，“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物的人，人人都是统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国家与人民没有强力的关系”。此外，在《平民主义》一文中，他对民主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认为联邦制可以制止军阀混战并使各地服从中央，一旦实行了联邦主义，旧的仇怨嫌憎，都可涣然冰释。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虽然带有新的思想形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成时的种种幼病，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论证极为可贵，他的“平民主义”思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他给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应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然后由无产阶级举行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说党的“一大”和“二大”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都是不确切的。“一大”距“二大”的对间不长，影响不大。“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影响较大，特别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后来竟将它发展成“二次革命论”。这种情况表明，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制定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方针，但每一步怎么走，每一步达到的目标如何，特别是第一步“最低纲领”怎样实施，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指出：“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密切相连，它的目的就是“私有制的规制完全废除”，从而达到“阶级制度的消灭”。这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探索。作为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的重要领导人，他的文章的刊发，必

然引起广大党员的重视，在党员中传播，从而使广大党员明确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第二，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所表达的“平民主义”的思想，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即“彻底反封建的”，“是与帝国主义不相容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场革命中，要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共“二大”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主义者认为既然进行的是“民主革命”，领导权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掌握。因此，陈独秀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中，对资产阶级处处采取妥协退让，不敢“理直气壮”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做了积极的探讨，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的任务，这就非常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实施自己的革命纲领，避免不必要的妥协退让，认清革命的对象和目标。第三，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李大钊已经显示出了朦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及“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领导权的主张。这两点主张对以后的革命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不少的人受“二次革命”的理论影响，在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中没有把目光放到社会主义前途上去，更忽

视了革命的关键问题是领导权问题。李大钊《平民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平民主义”思想突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藩篱，另辟蹊径，使正在苦苦寻求革命道路和革命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希望，抓住了革命的关键问题，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所阐述的“平民主义”思想（即民主主义思想）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础。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到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条约》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在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太平天国运动的悲剧表明：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百日维新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也证明：资产阶级共和

国方案在中国同样无法实现。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重任就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李大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自己担任中国北方领导人的时机，对中国的民主革命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研究了“平民主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研究了“工人政治”中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探讨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后革命的发展方向，最后得出妇女解放是“平民主义”的开端，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水火不相容”，“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紧密相关的结论。这些结论实际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依靠的力量、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在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家的不断探索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提出的“平民主义”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对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广泛探讨。虽然这种探讨还很不成熟，但它却开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之先河，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后来毛泽东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完善而形成的。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一文，1923年1月16日首先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上发表，当时的署名为李守常。1923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套《百科小丛书》，把《平民主义》列入第15种，仍署名李守常。这次评注即以商务印书馆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目前已有的整理成果。

一 “平民主义”的潮流

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近更借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的力量，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沉沉睡梦于专制的深渊里的亚洲。他在现在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今人对于“平民主义”的信仰，亦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无论他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障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一切前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

义”移动着的。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我们如想限其飞翔的羽翮于一个狭隘的唯知论者公式的樊笼以内，我们不能得一正当的“平民主义”的概念。那有诗的心趣的平民主义者，想冲着太阳飞，想与谢勒（Shelley）^①和惠特曼（Whitman）^②抃扶摇而上腾九霄。

【注释】

①谢勒：今译席勒（1759—1805），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其重要的作品有《裴爱斯柯在热那亚》（剧本）、《阴谋与爱情》（剧本）、《华伦斯坦三部曲》（剧本）、《唐·卡洛斯》（剧本）、《玛丽亚·斯图亚特》（剧本）、《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他的剧本和诗歌被译成多国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

②惠特曼：美国诗人，生于1819年，卒于1892年，纽约州人。曾做过新闻记者、报刊编辑，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1839年从事诗歌创作，1873年因瘫痪开始了专业写作生涯。他主张诗歌必须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启发性。他的诗歌对欧洲和美国诗歌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其诗歌代表作是《叶草集》，已译成多国文字流传世界各地。

二 “平民主义”字义的解释

“平民主义”是 Democracy 的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有译为“民治主义”的，有译为“唯民主义”的，亦有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以避“民主”这个名词，免得与他们的国体相抵触。“民主主义”用在政治上亦还妥当，因为他可以示别于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①，而表明一种民众政治。但要用他表明在经济界、艺术界、文学界及其他种种社会生活的倾向，则嫌他政治的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民治主义”与 Democracy 的语源实相符合。按希腊语 demos，义与“人民”（People）相当，kratia 义与“统治”（rule or government）相当，demo kratia，即是 Democracy，义与“民治”（People's rule or popular government）相当。此语在古代希腊雅典的政治家 Pericles（生于纪元前四百九十五年，卒于四百二十九年）时代^②，亦为新造。当时的人觉得有为新理想立一个新名词的必要，但亦曾遭嫌

新者的反对，后来这个名词，卒以确立。惟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③，学者用之，诂义尚各不同，全如亚氏分政体为三种：一、君主政治（Monarchy），二、贵族政治（Aristocracy），三、民主政治（Polity）^④。此三种政体，又各有其变体：君主政治的变体，为暴君政治（Tyranny）；贵族政治的变体，为寡头政治（Oligarchy）；民主政治的变体，为暴民政治（Democracy）。是知亚氏诠释 Democracy，不释为民主政治，而释为暴民政治；亚氏表明民主政治，不用 Democracy，而用 Polity。包莱表士氏（Polybius）则又用 Democracy 一语^⑤，以当亚氏的 polity。后来行用日久，终以表示“民治”的意义。但此种政制，演进至于今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最初“统治”（Rule）的意思，已不复存，而别生一种新意义了。这与“政治”（Government）一语意义的变迁全然相同。“政治”的意义，今昔相差甚远，古时用这个字，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不愿为的意思，如今则没有分人民为治者阶级与服隶阶级的意思了。自治（Self-government）一语，且与政治的古义恰恰相反。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

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故“民治主义”的译语，今已觉得不十分惬意。余如“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今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

【注释】

①贵族政治：希腊文“aristokratia”的意译。这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它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人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人民大会有名无实，军政实权掌握在监察官和长老会议手里，监察官和长老会议的成员全是贵族。

②Pericles：今译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代表人物。从公元前444年起，连续15年当选为将军，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积极推进雅典民主政治，对外推行大邦主义政策。晚年与斯巴达争霸希腊，最终导致波罗奔尼撒战争。伯里克利统治时期，被称为希腊历史上的繁盛时期。

③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生于公元前384年，卒于公元前322年。在哲学问题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由于受柏拉图的影响，最终仍陷入了唯心主义。他精通许多学科，被称为多科科学家，是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主要著作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他的理论体系对后世有

重大影响。

④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希腊文“demokratia”的意译，是一种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它最初产生于雅典，是为奴隶制服务的，其实质是工商业奴隶主专政。资产阶级革命之初，曾提出“民主政治”的口号，宣传“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反对封建专制起了积极作用。

⑤包莱表士：今译波里比阿或波里比乌（约公元前205—约公元前125），古希腊历史学家。曾任外交使节、骑兵军官等职。著有《通史》一书，描写罗马确立统治，形成世界强国。

三 “平民主义”与强力

“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诸人已曾表现于他们所理想的市府国家^①。近世自由国家，即本此市府国家蜕化出来的。在此等国家，各个市民均得觅一机会以参与市府国家的生活，个人与国家间绝没有冲突轧轹的现象；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这种国家已竟能够自显于政治总体。政治总体不完备，断没有完备的人；一说市府的完全，便含有公民资格完全的意思。为使公民各自知道他在市府职务上有他当尽的职分，教育与训练都很要紧。亚氏尝分政治为二类：一为与市府生活相调和的政治；一为以强力加于市府的政治。前者，官吏与公民无殊，常能自守他的地位，为政治体中的自觉的分于，觅种种途径以服事国家，没有一己的意思乖离于市府的利益。在这种国家，政治体由民众的全体构成，不由民众的一部，治者兼为民众的属隶。后者，官吏常自异于平民，利用官职以为自张的资具，一切政务都靠强力处理。把公民横分为治者与属隶二级，而以强力的关系介于其间，

以致人民与官吏恶感丛生，俨成敌国。在这等国家，治者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属隶则迫于强力不得不奉命惟谨罢了。现代的“平民主义”，多与亚、柏诸人的理想相合；而其发展的形势，尚在方兴而未已。宇内各国，没有不因他的国体政体的形质^②，尽他的可能性，以日趋于“平民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政制，本没有一定的形式，可以施行这种制度的，亦不限于某类特定的国家或民族。人民苟有现代公民的自觉，没有不对于“平民主义”的正鹄以进的。民主的国家，不用说了。挪威本是君主政治^③，亦濡染了“平民主义”的新色了。瑞士的“康同”^④，本是寡头政治，少数反对人民的执政与富豪，亦遭“平民主义”的打击而表示退败了。日本本是元老政治，今日亦栗栗危惧于“平民主义”气焰之下，而有危在旦夕之势了。欧洲大战中及其以后，独裁帝制下的俄罗斯，一跃而为劳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了^⑤。德、奥、匈诸国，亦皆变成民主共和国了。余如中欧一带，民主式的新国，亦成立了很多。可见今日各国施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只有程度高低的问题，没有可不可能不能的问题。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

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轨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国家与人民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罢了。马萨莱客（T.G.Masaryk）说^①：“‘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一语的本来的意义，是‘人民的统治’（People's rule），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划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技术的难问题。”这几句诠释现代平民政治的话，很能说出他的精要。可知强力为物，在今日的政治上已全失了他的效用。除在革命时期内，有用他以压服反对革命派的必要外，平时施用强力，适足为政治颓废的标识。

【注释】

①市府国家：今通译城邦，具有城市国家之义。通常

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其周围乡村地区，形成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典型的希腊城邦一般实行奴隶主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斯巴达和雅典是其中的代表类型。

②国体政体：国体指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表明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专政，它为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历史上主要有奴隶主阶级专政、地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四种体制。政体指的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即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与国体相适应，为国体服务，体现一定阶级的专政。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也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

③诺威：今译挪威，北欧国家。

④康同：Cantons 的音译，是瑞士州一级政权机构。

⑤苏维埃：由俄文音译而来，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出现了工人苏维埃，由各工厂工人代表组成。十月革命后，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后改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成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⑥马萨莱客：今译马萨利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生于摩拉维亚。当过学徒、牧师，获博士学位。主编过政治性周刊《时代》，创建了捷克人民党（后改名为进步党）。曾三次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任期内，对内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对外拉拢西方列强。主要著作有《一个国家的形式》、《理想与人格》、《现代人类与宗教》、《俄国与欧洲》、《社会问题》等。

四 “平民主义”与“多数政治”

有人说“多数政治”（Government by majority）即是“平民主义”。无论何种政治，没有不是以强力作基础的。在平民政治下，多数对于少数，何尝不是一种强制的关系？威尔逊氏便有这种论调^①。他说：“政府是止于权力与强力上的。无论何种政体，政府的特质不外乎权力。一方有治者，他方有被治者。治者的权力，或直接，或间接，要以强力为归。简单一句话，政府就是组织的强力罢了。但组织的强力，不以组织的武力为必要，实际就是若干人或全社会的意志表现于组织，以实行其固有的目的而处理公共的事务。……强力不必是外形。强力虽为权力的后盾，而不可以捉摸。权力寄托在治者身上，虽属彰明较著，然而权力止在强力上，则非表面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强力的形式非所必要。所以有一种政府，他的权力，永远不被武力的形式。就是今世各国，政机的运用，大都肃静，没有压制人民的事。换句话说，就是不靠强力的形式。然而强力的隐显，固与其分量的轻重无关；近世的良政府，不靠治

者的武力，而靠被治者的‘自由认可’（Free consent）。这就是政府以宪法与法律为轨范，而宪法与法律又以社会的习惯为渊源。这所包蓄的强力，不是一君专制的强力，不是少数暴恣的强力，乃是多数人合致的强力。国民都知道此强力之伟大，相戒而不敢犯，故其力乃潜伏而无所用。那民选的官吏与专制的君主比较，其权力所凭依的强力，本来没有什么优劣，而合众国总统的强力，比革命前俄皇的强力，或且过之。二者的根本差别，全在隐显之间。好象腕力一样，甲以他为后援，乙用他作前卫，用的时境不同，其为一种强力，则没有什么区别。”据此以知威氏所云组织的强力，即指多数人合致的强力。于此我们要问，此种强力的构成是否含有所谓被治者的“自由认可”在内？抑或这所谓被治者的“自由认可”，必待此种强力的迫制，或知道此种强力的伟大，因而相戒不敢犯，始能发生？我想既云“自由认可”，则必无待于迫制；既有强力的迫制，则必不容“自由认可”发生。就使“自由认可”的动机，多少由于自己节制自己牺牲，亦均属自由范围以内的事，决与自己以外威制的强力无关。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②非心服者，即不生“自由认可”。凡事可以得人的“自

由认可”，且可以称为心服者，必不是外来的强力的效果。服从的关系，若以强力的存否为断，那就是被动，不是自由；可以说是压服，不能说是悦服。压服的事，由于强力；悦服的事，由于意志；被动的事，操之自人；自由的事，主之自我。人为主动以施压服于己的强力一旦消灭，换句话说，就是非心服者的抵抗力一旦充足，服从的关系，将与之俱去。若说这种强力，必待所谓被治者的“自由认可”表示以后，始能发生，那么这种强力，不是多数人合致的强力，乃是多数人与少数人合成的国民公意。这种伟大的强力，实为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所具的势力；而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决不是这种伟大的强力压迫的结果。我尝说过，“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的政治，而“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共同的认可。商量讨论到了详尽的程度，乃依多数表决的方法，以验其结果。在商议讨论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方面意见的精神；在依法表决后，少数宜有服从全体决议的道义。“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

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共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共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由专制向“平民主义”方面进行，多数表决正是屏退依力为治而代之以起的方法。欧美有句谚语：“计算头颅胜于打破头颅。”（It is better to count heads than to break heads.）正好说明这个道理。威氏又说：“今世常说‘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些名词，于描写发达圆满的平民政治容或有当，然在今日，那作成舆论的多数所恃以制胜者，不在少数的理屈，而在少数的数弱。换句话说，就是多数所以排斥少数，不特用他们众多的声音，并且靠着他们众多的势力。这是很明了的事实，不容讳言的。多数所以能行其统治，不是他们的智慧使他们能够如此，实在是他们的势力使他们能够如此。多数党苟欲把他们的意见致之施行，他们所需的势力，与专制君主所以压服其民众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由威氏之说，可以反证出来，今日所谓自由国家的平民政治，尚未达于发达圆满境遇的事实，而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若把平民政治，亦放在“力的法则”之下，那所呈出的政象，将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云^③：“虽有民主，而操权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其所谓自治

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于余人。所谓民之好恶，非通国之好恶也，乃其中最多数者的好恶。且所谓最多数者，亦不必其最多数，或实寡而受之以为多。由是民与民之间，方相用其劫制。及此然后知限制治权之说，其不可不谨于此群者，无异于他群。民以一身受治于群，凡权之所集，即不可以无限，无问其权之出于一人，抑出于其民之泰半也。不然，则泰半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夫泰半之豪暴，其为可异者，以群之既合，则固有劫持号召之实权，如君上之诏令然。假所谓诏令者，弃是而从非，抑侵其所不当问者，此其为暴于群，常较专制之武断为尤酷。何则？专制之武断，其过恶显然可指；独泰半之暴，行于无形，所被者周，无所逃雪，而其人于吾之视听言动者最深。其势非束缚心灵，使终为流俗之奴隶不止。”（从严译^④）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其结果仍为强力所反抗，展转相寻，无有已时。“平民主义”的政治，绝不如是。现代的“平民主义”，已经不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而为“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不是对人的统治, 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我们若欲实现“平民主义”, 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 应该研究怎样可以学会管理事物的技术。

【注释】

①威尔逊: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生于 1856 年, 卒于 1924 年, 弗吉尼亚州人。当过律师、教授、州长。1913—1921 年任美国总统。任内主张政治经济的自由主义。首倡成立国际联盟。著有《国会政府》、《华盛顿传》、《美国人民史》等。

②“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意思是“靠力量让人服的, 人家不是心服, 是力量不足”。

③穆勒: 即约翰·穆勒 (1806—1873),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 生于伦敦。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 当选过议员。在哲学上接近唯心主义者休谟的经验论和孔德的实证论; 在逻辑学上对归纳法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 在经济学上以庸俗的生产费说代替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主要著作有《穆勒名学》、《功利主义》。

④严译: 指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名学, 今通称逻辑学。

五 “平民主义”与解放及联治

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

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人情多为习惯所拘，惰性所中，往往只见有旧的破坏，看不见新的创造，所以觉得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分裂的现象。见了国家有人民的地方的解放运动，就说是国权分裂了；见了经济界有农夫、工人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经济的组织分裂了；见了社会里、家庭里有妇女或子弟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社会分裂了，家庭分裂了；见了这些分裂的现象，都凑集在一个时代，凡在这个时代所制的器物，所行的俗尚，都带着分裂的色采，就说现在的时代是分裂的时代。看那国旗由一个黄色变而为五色^①，不是分裂的现

象么？北京正阳门的通路^②，由一个变而为数个，不是分裂的现象么？再看方在流行的妇人的髻，女孩的辮，多由奇数变而为偶数，不是分裂的现象么？中国有二个国会，二个政府，俄国分成几个国家，德、奥、匈及中欧一带的小民族纷纷的宣告自主，爱尔兰、印度对英的自治运动，朝鲜对日本的独立运动，不都是分裂的现象么？十数年来，国人所最怕的有两个东西：一是“平民主义”；一是“联邦主义”。国体由君主变为民主了，大家对于“平民主义”才稍稍安心。独这“联邦主义”，直到如今，提起来还是有些害怕，这因联省自治而起的国内战争，还是随时有一触即发的样子。至于文人政客，不是说联邦须先邦后国，就是说中国早已统一；不是吞吞吐吐的说我是主张自治，避去联邦字样，就是空空洞洞的说我是只谈学理，不涉中国事实。推本求源，一般人所以怕他的原故，都是误认他是分裂的现象，所以避去这个名词不讲，都是怕人误认这是一个分裂的别名。

其实这些人都是只见半面，未见全体。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平民主义”、“联邦主义”，都是这一条

线上的记号。没有联邦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平民政治”，必不能成功。有了联邦的组织，那时行“平民政治”，就象有了师导一般。因为“平民政治”与“联邦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北京正阳门的通路变少为多，妇人的髻、女孩的辫变奇为偶，一面固可以说是分裂，一面又是联成一种新组织、新形式，适应这新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特质，发挥时代美。中国大局的分裂，南一国会，北一国会，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俄国当此社会根本改造的时候，这里成立一个劳农苏维埃共和国，那里成立一个劳农苏维埃共和国，一时也呈出四分五裂的现象。奥国、匈国、德国都是这样，一方面象是分裂，一方面方在改造一种

新组织。这种新组织，就是一个新联合。这新联合的内容，比从前的旧组织更要扩大，更要充实；因为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世界的种种生活，不断的发生新要求，断非旧组织旧形式所能适应的，所能满足的。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北京正阳门若是照旧只留一条路，那些来往不绝的车马，纷错冲突，是断乎不能容纳的。方今世界大通，生活关系，一天比一天复杂，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联邦主义”于这两点都很相宜。因为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联邦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间，又和每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联邦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平等的组织，确合职分的原则，达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中间的界限，都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

照此看来，“联邦主义”不但不是分裂的种子，而且是最适于复合、扩大、殊异、驳杂生活关系的新组织。许多的国家民族间，因为感情、嗜性、语言、宗教不同的原故，起过多年多次的

纷争，一旦行了“联邦主义”，旧时的仇怨嫌憎，都可涣然冰释。看那英人与法人有几世的深仇，当那英国的政治家引诱坎拿大人创造一种联邦^③，确定地方自治权的时候，英、法二民族间也曾起过战争；到后来坎拿大行了联邦主义，法国人的坎人变成了忠于英国的人民，英国人的坎人，亦甘愿服从法人为坎人的首领，两个民族却相安无事了，他们激烈的冲突，就是这样了结。有一位劳利耶翁（Sir Wilfred Laurier）^④，是法国的旧教徒，多年居坎拿大的政枢，到了英国各部间起了巩固结合运动的时候，大家都承认这位法国人的坎拿大政治家是热心英国联合巩固的一个重要人物。再看那南非洲的英国人与荷兰人也曾起过复仇的战争，一旦有了联合，作自治的基础，那英、荷二国人就和好如初。勃亚人（Boers）因为享了点比较的自治的生活^⑤，也就忠于英国政府了。中国自改造共和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于中央，亦都不肯服从；那蒙、藏边圉，不是说自主，就是说自治。依我看来，非行“联邦主义”不能造成这个新联合。又如，俄国那样大的领域，那样杂的民族，想造成一种新联合、新组织，亦非行“联邦主义”不可。果然这新造的俄罗斯社会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亦是一种联邦的组织。象

俄国这种联邦共和，就是一个俄国各部及各族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他与英国的联邦、瑞士的联邦迥乎不同。俄国的联邦苏维埃共和，是由俄国各部劳农组织而成的社会共和，倘为苏维埃所联合的各部分的劳农想互相分离，无人可阻当们这样做。但是英国的联邦，还是靠着强力来维持的。英国对于非洲、亚洲、澳洲的人民及勃业人，多少还是有些压服的关系。就是爱尔兰的自治运动，新芬党亦曾费了多年努力奋斗的工夫^⑥，才能脱了英国的一半的羁绊。英国资本家今尚夸言，我们有一联邦，就是万邦联合国。但是不论何时，倘若这联邦的人民，想离不列颠的压迫，那不列颠的中级社会，将用武力征讨他们。从前对于美国，最近对于爱尔兰和印度，都是明显的例证。英国的联邦组织，将来必不免有些变动。瑞士的联邦共和，是一个许多的“康同”（Cantons）的联合。但这联合亦是靠兵力造成的。瑞士的“康同”，苟有欲与瑞士脱离关系的，必遭瑞士共和军的讨伐。大战终结后，奥、匈也改成民主联邦了。德国的联邦，原来是几个君主组织的，够不上称为纯粹的联邦。经过这一回的革命，把那些君主皇族总共有二百七十八人，一个一个的都驱逐去了。那普鲁士的霸权^⑦，也根本摧除净

尽，才成了真正的民主联邦。美国是一个纯正的民主联邦国，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是联邦化的世界，亦是“平民主义”化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组织，亦必为联邦的组织，“平民主义”的组织。联邦主义，不过是“平民主义”的另一形态罢了。

【注释】

①国旗由一个黄色变而为五色：黄色（旗）指清朝的国旗黄龙旗；五色（旗）指中华民国的国旗，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蒙、回、藏、满五族共和。

②正阳门：前门，旧称正阳门。

③坎拿大：今译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④劳利耶翁：今译劳里埃（1841—1919），加拿大总理（1896—1911），自由党领袖。派遣军队帮助英国与布尔人作战，建造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开发西部地区，增强加拿大对英国的独立性。

⑤勃亚人：今译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纪在南非建立了奴役黑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该地发现金矿，英国1899年发动战争，吞并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

⑥新芬党：爱尔兰文 Sinn Fein 的译音，意谓“爱尔兰人的爱尔兰”。1905年建立的爱尔兰政党，旨在联合拥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护爱尔兰独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左翼曾参加1916年都柏林起义，并领导了1919—1921年的反英战争。其右翼慑于群众运动的扩大，1921年与英政府签订条约，割裂了爱尔兰：北部仍归英国，南部取得自治领地位，成立爱尔兰自由邦。新芬党因此引起激烈分化。

⑦普鲁士：欧洲近代国家。原为普鲁士人居住地，16世纪称普鲁士公国，18世纪初成立普鲁士王国。19世纪初被法国战败，后通过丹麦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兼帝国皇帝。

六 “平民主义”与国际运动

上古时代，人与人争，也同今日国与国争全是一样。以后交通日繁，人人都知道长此相争，不是生活的道路，于是有了人群的组织。到了今日，国际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多，你争我夺，常常酿成大战，杀人无算，耗财无算，人才渐悟国与国长此相争，也不是生活的道路，种种国际主义的运动于是乎发生。现代国际主义的运动，可大别为二类：一类是中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象那盎格鲁日尔曼协会^①、盎格鲁奥特曼协会^②，是为增进国际上友谊的团体；象那海牙平和会议^③、海牙仲裁裁判、新世界共和国代表五年会议、平和与自由同盟、妇人同盟、基督教联合同盟、民族联合同盟、威尔逊提议的国际大同盟和这回哈丁氏提议的太平洋会议等国际的组织^④，不是为反对战争，就是为解决国际间的纠纷问题。有些人对于这种国际主义的运动，抱很大的希望，以为有了增进国际间友谊的、解决国际间纠纷问题的、反对国际战争的国际的团体，那国际间的误解与战祸，自然可以减免很多。特别是对于威

尔逊提议的国际同盟，希望更大，以为这种组织，便是世界的联邦的初步。本来邦联与联邦的区别，不过程度上的差异，邦联就是各独立国为谋公共的防卫、公共的利益所结的联合，加入联合的各国，仍然保留他自己的主权。这联合的机关，全仰承各国共同商决的政策去做。古代希腊的各邦，后来瑞士的“康同”，德国的各邦，美国的各州，都曾行过。联邦就是一国有一个联合政府，具有最高的主权，统治涉及联邦境内各邦共同的利益，至于那各邦自治领域以内的事，仍归各邦自决，联合政府不去干涉。那采行一七八九年宪法以后的美国，采行一八四八年宪法以后的瑞士，都是此类。美国的联邦，是由一七八九年以前各州的邦联蜕化而成的。这邦联是由一六四三年四个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同盟蜕化而成的。将来世界的联邦，如能成立，必以这次国际同盟为基础。由现在的情势看，恐怕这只是一种奢望。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帝国主义即存在一天。在帝国主义冲突辗转之间，一切反对战争的企图，都成泡影，一切国际的会议，都不过是几个强国处分弱小民族权利分配的机关罢了。帝国主义之下，断没有“平民主义”存在的余地。不是“平民主义”的联合，决不是真正的联合。一类是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

的运动。这种运动，与中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大异其趣。他们主张阶级争斗，他们不信并且不说“全人类都是兄弟”。必欲讲这一类的话，只可说“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兄弟”。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为平和，乃是为战争。他们全体有一个国际的公敌，就是中产阶级。这一阶级，遇有必要，都联合起来，和劳动阶级宣战。象那毕士麦助捷尔士（Thiers）反对巴黎的康妙恩（Commune of Paris）^⑤，象那德国和协约国联合反对俄国的布尔札维克（Bolshevik）^⑥，都是显例。劳动阶级为对抗中产阶级的联合，必须有一个劳动阶级的国际联合。不但于日常发生的产业的争议，和防止国外破坏罢工同盟的人，这种联合很是有用，就是在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工人，亦能阻止他们的执政者予革命成功的地方以打击。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其目的不在终止战争，而在变更战争的范围，而在使战争不为国家的，而为阶级的。他们认战争不是恶性的结果，不是国际间误解的结果，乃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结果。这帝国主义，在他的基础上，是经济的，和资本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战争必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劳动阶级的国际团体，有一八六四年成立的“第一国际”（The First

International)^①，巴黎康妙恩失败后，渐归渐灭；有一八八九年成立的“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②，至一九一四年，停止了它的存在；有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③，现方蓬蓬勃勃势力日大，组织亦比从前的国际团结愈益巩固，愈益完密，有常设的执行委员会。这两种国际主义的运动，即是中产阶级的国际联盟与劳动阶级的第三国际，必有一种为将来国际大联合的基础的。看现在的形势，后者比前者有望的多。

本于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常体现而为“大某某主义”（Pan……ism）。持这个主义的，但求逞自己的欲求，以强压的势力迫制他人，使他屈服于自己肘腋之下。这样的情形，在国家与国家间有，在民族与民族间有，在地方与地方间有，在阀阅与阀阅间有，在党派与党派间亦有。于是世界之中，有所谓“大欧罗巴主义”^④，有所谓“大美利坚主义”^⑤，有所谓“大亚细亚主义”^⑥；欧洲之内，有所谓“大日尔曼主义”^⑦，有所谓“大斯拉夫主义”^⑧；亚洲之内，亦有所谓“大日本主义”；近几年来，中国之内，亦有所谓“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同在北方主义之下，亦有两种以上的大某某主义在那里暗斗；同

在西南主义之下，亦有两种以上的大某某主义在那里对峙。以欧战的结果，和中国的政情来看，凡是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论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军阀，一个党派，一个个人，没有不归于失败的。反乎大某某主义的，就是“平民主义”。故大某某主义的失败，就是“平民主义”的胜利。一个是专制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尚力，一个尚理；一个任一种势力的独行，一个容各个个体的并立。凡是一个个体，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倘有悍然自大，不顾他人的自由，而横加侵害的，那么他的扩大，即是别人的削小；他的伸张，即是别人的屈辱；他的雄强，即是别人的衰弱；他的增长，即是别人的消亡。一方的幸运，即是他方的灾殃；一方的福利，即是他方的祸患。那扩大、伸张、雄强、增长、获幸运、蒙福利的一方，固然得了，然而在那削小、屈辱、衰弱、消亡、罹灾殃、受祸患的一方，其无限的烦冤，无限的痛苦，遏郁日久，亦必并发而谋所以报复与抵抗。且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苟有第二个持大某某主义的来与他争大，按之物莫能两大的道理，争而失败的，二者中间必有一个。故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败亡于众弱的反抗，即粉碎于两大俱伤，其结果必失败于“平民主

义”之前而无疑。

【注释】

①盎格鲁日尔曼协会：英国和德国两国双边协会。盎格鲁人为英国古代民族，日尔曼为德意志主要民族，故用以称呼英、德两国。

②盎格鲁奥斯曼协会：英国和土耳其两国双边协会。奥斯曼也称奥斯曼，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故用以称呼土耳其。

③海牙和平会议：第一次于1899年5—6月举行，参加的有中、俄、法、英等26国，第二次于1907年6—10月举行，参加的有44国。两次会议通过了13个公约和三个声明，合称海牙公约，旨在维护和平和解决国际争端。

④哈丁：今译哈定（1865—1923），美国总统（1921—1923），共和党人。1921—1922年召开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及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形成了“华盛顿体系”。

⑤毕士麦助捷尔士反对巴黎的康妙恩：毕士麦，今译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德意志帝国的创建者。1861年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推行“铁血政策”，以王朝战争的形式统一了德意志。担任德国宰相时，对内颁布《反社会党人法》，镇压工人运动，对外采用结盟政策，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因与德皇威廉二世不和去职。晚年著有《回忆与思考》。捷尔士，今译梯也尔（1797—1877）。生于法国马

赛，做过律师，办过报刊，历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首相。普法战争时，任“国防政府”首脑，同普鲁士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勾结普鲁士，镇压了巴黎公社。1871年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康妙恩，巴黎公社的音译。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所建立的革命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后在梯也尔政府的镇压下失败。

⑥布尔札维克：今译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时，列宁同马尔托夫进行了激烈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列宁获多数票，即“布尔什维克”。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共产党的通称。

⑦第一国际：又称国际工人协会，是1864年成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第一个群众性国际组织。其主要文件《临时章程》、《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起草。该组织支持各国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内部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促进了各国工人运动高涨。1876年解散

⑧第二国际：1889年7月由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成立的国际组织。它的前期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工人运动中的纲领和原则问题，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后期由于恩格斯逝世，各种机会主义泛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各国政党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破产。

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于莫斯科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国际代

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其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

⑩大欧罗巴主义：欧罗巴洲，简称“欧洲”。大欧罗巴主义指以欧洲为中心的沙文主义思想。

⑪大美利坚主义：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大美利坚主义指以美国为中心的沙文主义思想。

⑫大亚细亚主义：亚细亚洲，简称“亚洲”。大亚细亚主义指以亚洲为中心的沙文主义思想。

⑬大日尔曼主义：日尔曼，德国的主要民族。大日尔曼主义指反映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沙文主义的思潮和运动。

⑭大斯拉夫主义：斯拉夫民族现分为三支，即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该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欧洲，自19世纪起小部分迁到美洲和澳洲。大斯拉夫主义指以斯拉夫民族为中心的沙文主义思想。

七 “平民主义”的开端

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现代欧美号称自由的国家，依然没有达一以真正的“平民主义”的地步，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的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即使有人对于妇女的利害关系稍加注意，那人代为谋的事，究竟不是真能切中妇女们本身利害的，决不象妇女自己为谋的恳切。“人民”（People）这个名词，决不是男子所得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一定亦包含在内。从前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主张妇女应有参政权的理由，就是根据《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及《北美合众国宪法》的解释。他们说在《美国宪法》里，实无一语一句，拒绝妇女在州或国的选举权。《美国宪法》的前文有云：“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北美合众国制定此宪法。”（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人民”（People）里，当然包有妇女在内。那么人民在宪法上应享的权利，

妇女当然和男子一样享有。这是他们的堂堂正正的理由。费烈士（Brougham Villiers）说：“纯正的‘平民主义’不是由男子所行的民主民权的政治，是由人民全体所行的民主民权的政治。”（The formula of democracy is no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men but by the people）费氏郑重的申明“不是由男子所行的”，“乃是由人民全体所行的”，就是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上当有平均发展的机会。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以变动。富者可以变为贫，贫者亦可变为富；地主与资本家可以变为工人，工人亦可以变为地主、资本家。社会若经适当的改造，这等阶级都可归于消泯，惟独男女两性，是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况且“平民主义”，本是母权时代的产物，故“平民主义”为女性的。后来经济上生了变动，母权制渐就崩坏，“平民主义”即随之消亡。父权制——男性中心的家族制——继之而起，专制主义于是乎产生，故专制主义为男性的。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伊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排出于社会的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精神。因为

男子的气质，有易流于专制的倾向，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真正“平民主义”的精神。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妇女除外，男女的界限，异常的严，致成男子专制的社会。不独男子对于女子专制，就是男子对于男子，亦是互为专制。社会生活的内容，冷酷、无情、干燥、无味，那些平和、优美、博爱、仁慈的精神，没有机会可以表现出来。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平民的社会。没有“平民主义”化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政治。

世界各国的女权运动，本有很长的历史。先驱者的责任，早已落在高加索人种（Caucasian Race）妇女的头上，就中尤以美国的妇女为最活泼猛进。在伊们指导之下，成立了许多的妇女团体。一八八八年成立的妇女国际会议，及国际妇女参政权联合会等国际的联合，都多赖美国妇女的尽力。但女权运动的成功，则以北欧诸国为最早。一九〇一年诺威的纳税妇女，已取得市政机

关选举权。至一九〇五年，诺威离瑞典而独立，妇女运动，益见进步。一九〇七年，诺威的纳税妇女，取得了中央议会选举权。芬兰的妇女，自一八六七年，妇女即取得地方机关选举权；至一九〇六年，地方与中央各项议会，均与男女以同等的普及的选举权。一九一〇年，中央议会选举时，男女投票的人数几乎相等，妇女当选者十七人，约当男议员十分之一。丹麦的妇女，于一九〇八年，取得地方机关选举权。一九一五年，丹麦新宪法又与妇女以中央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该宪法规定凡品行端正的女子及男子年满二十五岁者俱有参政权。一九一八年，丹麦举行议会选举时，妇女参加选举者为数很多，当选者共有九人。瑞典的妇女，未婚而纳税至若干额以上者，于一八六二年，即取得地方选举权。至一九〇九年，一切品行端正的妇女，对于地方机关俱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英国的新选举法，以中央议会选举权授与妇女。按照这新选举法，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殆皆享有选举权，妇女则须年满三十且有独立住所者，始有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英国议院又通过一个《妇女资格赋与案》（《Qualification of Women Act》），承认妇女与男子对于中央议会有同等的被选资格。是年十二月，中

央议会选举时，妇女投票，甚形踊跃，有些选区妇女投票者竟多于男子。但通国当选的妇女，只有一位爱尔兰女子，且因伊是新芬党人，有政治革命的罪案，虽当选而无效。英领纽吉兰（New Zealand）自一八八三年^①，凡成年的妇女，俱得本邦中央议会的选举权。澳洲亦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各邦陆续授妇女以选举权。至一九〇八年，各邦妇女对于中央议会，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但纽、澳各邦的妇女被选举权，大都尚未取得，故该处的妇女参政运动，尚在激烈进行中。美国自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一七年，共有十九州妇女得有选举权，至一九一八年正月，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一种宪法修正案，明定“联邦及各州选举权不得因男女的差别而有歧异”。这修正案于一九一九年通过联邦参议院，于一九二〇年得联邦各州全体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批准，美国各州的妇女，遂与男子有同等的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罗斯社会联邦共和国的新宪法，承认男女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九一九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宪法，承认男女完全平权。那一年的联邦议会的选举，妇女当选者有三十六人，有二十一人属于社会党。一九一九年奥国国民制宪团体中，已有女代表参加。瑞士的各“康同”中，

亦有以参政权授与妇女者。一九一九年五月，法国众议院亦曾通过一案，承认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但未得上院通过。中国广东、湖南、浙江等省制定省宪，亦规定了男女平权。这种运动，都与普通选举运动同是向“平民主义”进展的运动。

自劳农俄国成立后，政治学者乃为这种新式的政治，立了一个新名词。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这个名词，创立未久，在字典上还没有他的地位。创造此新语，亦须借重子丰富的希腊语源。希腊语 Ergates，意即“工人”（Worker）；与 cracy（Rule）相联缀，训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种政治，的确含有统治（Rule）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一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过，那 Ergatocracy 一语中的要素（cracy）的意义，将生一广大的变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故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便自然的实现。那时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因为除去老幼废疾者外，人人都是作事的工人。这种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而由工人执行的事物管理。这里所谓工人，当然没有男女的差别。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

“工人政治”，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故有人说这“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而列宁氏（Nikolai Lenin）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Moscow）“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亦曾极力辨明中产阶级的“平民主义”（Bourgeois democracy）与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Proletarian democracy）的区别。后来又在他的《国家与革命》并别的著作里，屡屡赞美这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可见“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学者，所以必须另立新名的原故，乃是因为“平民主义”的名词，已为资本主义的时代用烂了，已为卑鄙的使用玷污了，是“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意思^②。鲍洪氏（Bohun）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说‘平民主义’了。你们

想你们是“平民主义”者么？但是你们不是的。你们想你们要‘平民主义’么？但是你们不要的。你们是工人政治派，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个被卑鄙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主义’这个名词给自由派的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几句话，可以表明他们的态度，可以表明他们避开“平民主义”一语的理由。

【注释】

①纽吉兰：今译新西兰，大洋洲的国家。

②“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语出《荀子·不苟》；另见《楚辞·渔父》。意思是刚洗完头的人要用手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完澡的人一定要抖抖衣上尘土，展现出全新面貌。

八 总结

总结几句话，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

附
录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评介

刘建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揭开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序幕。北洋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逮捕学生运动的领袖，发布总统训令“严禁学生干政”，并准备更换教育总长和各校校长。为抗议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北京中等以上的学校宣布总罢课，并联络全国各地学生，商讨采取一致行动，一场反帝爱国斗争迅速展开。面对高涨的学生运动，北洋政府以野蛮、卑鄙的手段破坏并逮捕了更多的学生。北大法学院教室变成临时监狱，人满为患。为支援北京的学生，1919年6月3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工人的影响下，上海的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阶级成为五四运动后期的主流。

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以后的“六三”工人大罢工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登上了历史舞台，肩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领导重任，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迫切需要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在当时，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几乎同时出现。因此五四运动时期，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而且还有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及其流派传入中国，如法国反动哲学家的生命哲学，奥地利马赫和德国的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其中以杜威及其学生胡适宣传社会教育主义（实用主义）影响最广。此外，还有冒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修正主义等等。上述思潮，异彩纷呈，其阶级属性不同，影响各异。为了使已经做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找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并排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李大钊担起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他曾写成《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来介绍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5月至11月，为了更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主要内

容如下：

第一，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先说明了撰写此文的目的，介绍了写作该著作的准备工作。他说：“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经济史上的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根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的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第二，具体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阐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发展中，李大钊指出：“历史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的物质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尤其重要的是，李大钊大胆地引用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

的重要段落，并加上了自己的分析和见解，比较完备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指出，以往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李大钊在介绍唯物史观时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其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的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他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帮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切，结局这旧社会组织必崩溃不可。这就是社会革

命。”如此，李大钊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借马克思之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人们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使人们通过该理论去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去认识历史发展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从而起到了武装人们头脑的作用。

第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向人们系统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有关阶级斗争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阐述了阶级斗争产生的历史。李大钊指出：自土地公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其次，介绍了阶级斗争的定义。李大钊指出：“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李大钊从经济着手，研究阶级斗争，抓住了阶级斗争学说的精髓。再次，李大钊分析了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他指出：“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价值”。阶级斗争因而产生。复次，李大钊指出阶级

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矛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李大钊指出：“这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中采取敌对形式的最后”，“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最好的方法”。最后，李大钊指出：“然而马氏与昂格斯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李大钊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第四，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李大钊阐明：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然后叙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实质并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李大钊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实质。他写道：“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器。

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器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物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产的一小部分”；“马氏的‘余工价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化来的”。李大钊的上述言论，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创造的。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论”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的实质，并联系到世界经济。他指出：Trusts（托拉斯）和 cartels（卡特尔）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 Trusts 与 Cartels 的组织，……把资本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这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财富日益集中的过程。资本越集中，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越加剧，就越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物质基础。因为资本越集中，对劳动者的剥削越加沉重，资本主义统治越动摇，无产阶级是震撼资本主义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消灭资本主义也就是他”。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受时代和资料的限制，有些阐述还不

够完善，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够准确。如：他还没有完全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理论的不同。但它产生在中国大地上，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份宝贵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写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之时，中国正处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迫切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李大钊应时代的要求，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为奋斗的中国人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自此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还没有在中国整本出版，只有零散的译文。李大钊以自己浓厚的日文功底及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到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译本，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集中翻译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等等，这对于此后我国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刊载之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西方思想在中国流传，但因这些思想传播的方式方法不当，传播的渠道不畅，人们只了解到

只言片语，对各家思想只略见一斑，对于马克思的认识也是如此。李大钊的文章刊出，使人们首次可以系统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于当时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起了积极的鼓舞和指导作用。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第一，它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引入了中国，使中国思想界这潭死水惊起波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家学派，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基础出发，从经济上说明引起社会变动的原因和动力，从而为人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一场革命。第二，李大钊通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使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几次论战，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深入人心，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共分11部分，于1919年5月和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6号上发表，署名是李大钊。解放前与建国后分别收入《守常文集》和《李大钊文集》，影响极大，故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而我们把它作为《平民主义》一书的附录。

这次评注，采用 1949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守常文集》所收录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¹⁾。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了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于，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

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②，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简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注释】

①昂格思：今译恩格斯，是和马克思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德国人，1820年生于德意志莱茵省巴门市工厂主家庭，1895年病逝。

②本志：指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①。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②、李嘉图（Ricardo）^③、杰慕士·穆勒（James Mill）等^④，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

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作，他也这样作，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履、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

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

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注释】

①亚丹·斯密：今译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生于苏格兰，曾

做过大学教授、大学校长。1769年回到家乡从事政治经济学著述，其代表作是《原富》，该书系统介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②马查士：今译马尔萨斯（1776—1834），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人口理论体系的建立者。生于英格兰土地贵族家庭，曾任神学院研究员、政治经济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1789年发表了他的成名著作《人口原理》，创立了人口理论，人称“马尔萨斯主义”。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政治经济定义》等。

③李嘉图：即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善者。出生于伦敦交易所经纪人家庭，曾任英国下议会议员。181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品《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该书的出版，在经济理论上形成了资产阶级范围内所能达到的较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冲突。

④杰慕士·穆勒：今译詹姆斯·穆勒（1773—1836），英国庸俗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要义》一书，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李嘉图的学说，但又使之庸俗化。在历史学上主要的著作有《不列颠印度的历史》，第一次对英国侵占印度的史料进行了有系统的整理。在哲学上的主要著作有《人类思想现象的分析》。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析，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

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

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这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①，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②，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象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利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利的基

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ry、Mignet 及 Guizot 辈继起^③，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④，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 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 (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而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人的商法，与那最近

英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⑤，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

道主义的宗教^⑥。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注释】

①孔道西：今译孔多塞（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理论家。生于勃孟。参加过1791年的制宪会议。认为改善人类理性即可促使社会进步，极力维护私有财产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把资本主义制度描绘成符合“理性”、“自然”的制度。其代表作是《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

②桑西门：今译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生于巴黎贵族家庭，1777年入伍，任骑兵少尉；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并荣获勋章；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自动放弃伯爵头衔和贵族称号，自称公民。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人类科学概论》、《论实业制度》、《实业家问答》。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对未来社会作了美妙的幻想，但他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③Thierry、Mignet、Guizot：分别译为梯也里、米涅和基佐。梯也里（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潜心研究英法历史，提出阶级斗争理论。主要著作有《论英国宪法史》、《论第三等级的形成及其胜利》等。米涅（1796—188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在书中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反对人民群众的斗争，把斗争只看成是资产阶级和农业贵族之间的斗争。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翼人物，主要著作有《英国革命史》、《欧洲革命史》、《法国文明史》。

④普鲁东：生于1809年，卒于1865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生于法国贝桑松小手工业者家庭，当过雇工、排字工、刊物主编、国际会议议员。1864年加入第一国际，主要著作有《经济矛盾体系或哲学的贫困》、《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等。书中宣传的观点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

⑤脱拉斯：今译托拉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生产同类产品或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一些企业为了垄断某些产品的销售获得高额利润而组成的一种垄断组织，参加托拉斯的企业在生产、销售、财务方面都丧失了独立性，而由其董事会掌握。托拉斯主要有两种形式：金融控制和企业完全合并。

⑥人道主义：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先进

附录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的思想家为摆脱封建神学束缚而提倡的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来考察一切的思潮。人道主义反对禁欲，宣扬个性自由。人道主义在反对封建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资产阶级统治确立后，资产阶级经常以人道主义掩饰、调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 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

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二) 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的领主与农奴^①，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革命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分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见。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

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防阻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象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

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三) 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方法，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

变革时代，由其时代的决心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②、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③）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

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注释】

①领主：封建领主的简称。早期封建社会中受封领地或世袭领地的封建主，对国王来说，是封臣、是附庸，但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是最高统治者，拥有立法、司法、征税、募兵、铸币的权力。领主制经济在西欧最为典型。

②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一种生产方式。对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原始社会公社制；有人认为是奴隶制；有人认为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形态；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

③河上肇：日本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生于1879年，卒于1946年，出身于山口县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法、德、比等国。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和理论家，对留学日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贫乏物语》、《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

六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①。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②。当时繁盛的意大利共和国中，特如 Venice 的统治阶级^③，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④，其时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 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⑤，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

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象那拿破仑派咧^⑥，布尔康家正统派咧^⑦，欧尔林家派咧^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⑨。他在《社会学研

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 Wilhelm Roux 所发见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⑧。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

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命运，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代、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注释】

①阶级竞争说：今通称阶级斗争学说。

②十字军之役：即“十字军东征”。指西欧封建统治

阶级为缓和国内社会矛盾、扩大势力、掠夺财富而发动的对地中海沿岸各国的侵略战争。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欧侵略者，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主的陵墓耶路撒冷的旗号涌向东方，每个十字军军人的衣袖上都缝有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东征共有 18 次，历时 200 多年，最后以失败告终。

③Venice：即威尼斯，意大利北部著名的港口和工商业城市。市内水运交通闻名于世，是著名的旅游城市。该城建在距大陆 4 公里的 118 个小岛上，由 117 条水道和 400 多座桥梁连接而成。中世纪时，以经营东西方转口贸易而出名。

④路德：即马丁·路德（1483—1556），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发起者，基督教路德宗的创始人。生于矿主家庭，担任过神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是主张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

⑤康士坦丁堡：又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旧名。公元 330 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于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克该地后改称今名。

⑥拿破仑：即拿破仑一世（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科西嘉破落贵族家庭出身。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领导了反对欧洲反法联盟的战争，维护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波旁王朝复辟后，被流放，死于流放地。

⑦布尔康家：今译布尔乔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主要包括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组织。

⑧欧尔林家派：今译奥尔良派，19世纪中、晚期法国保守党中的一派，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基佐、梯也尔、巴罗等是该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⑨斯宾塞：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生于1820年，卒于1903年，出身于德比尔小学教师家庭，当过教师、铁路工程师，后成为《经济》杂志副主编。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所谓综合哲学，他把人类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主张不可知论。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社会静态学》、《群学肄言》。

⑩Wilhelm Roux：今译威廉·儒（1850—1924），德国解剖学家，实验胚胎学创始人，发育机制学的创立者。

七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Eugenio Rignano 驳他道：“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象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

那么那主要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行的轨道上，有了一定的变更，一定可以贡献很大的经济利益于北方民族，而大不利于南方民族。但我想在历史纪录中，寻找一种族或一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目的的，是一件无益的事。”这一段话可谓中了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

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而在另

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了疑问。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工阶级的联合活动，屡见成功，居然能够屈服经济行程的趋势。这种劳工结合，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s）为最有效果^①，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工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大。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

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巩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试把英、法二国的土地所有制比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其子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土，而与其余人口相较，为数甚少，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大地产制^②。在法国则经数世纪的时间，贵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人民人口的数，又占全体的大部，故利在分割而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子孙相反^③，于是中级人民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大财产制的再见。他们二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田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他们经济的表现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一则发生很大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田禾的牧业、全国的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的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一则发生土地过于割裂、所有者自治其田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风盛行、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

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話，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至法律，仍是在那可以容他发生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例如现代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境遇日趋于困难；一方面益以促其阶级的自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活动的效果足以自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自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行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行程。英、法二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力，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力阶级；以后的事，也全是阶级竞争的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防遏大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禁抑小财产制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连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

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

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不良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仅求自足的靠着自然的地方居多，靠着人力的地方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较大。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

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十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的时候，彼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而那自觉的经济阶级，实在晓得利用这无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目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注释】

①工联：19世纪中叶出现于英国，全称是英国工人联合会。后美国及其他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工人联合会。英国工联鼓吹阶级合作，反对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把经济斗争看成是工人斗争的主要目的，主张通过合法的协商来解决劳资间的一切矛盾。

②大地产制：由大授地制演化而来。大授地制是16世纪—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奴役印第安人的一种土地制度。西班牙在美洲掠夺的土地归王室所有，西班牙王室将这些土地授于殖民者，殖民者首领分得大片土地，印第安人可使用小块土地，但须向殖民者服役或交代役金，1720年，该制度废除，原大授地主变成了大庄园主，他们侵占印第安人乡村的公地，扩大自己的地界，印第安人为耕种小块土地，就要付出沉重的地租和繁重的劳役。由此形成了大地产制。

③诺曼侵略者：1066年英王爱德华死，但没有子嗣，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公爵，借口前王遗嘱，纠集诺曼封建主和骑士，在教皇的支持下渡海侵入英国，并做了英国国王，称威廉一世，人称之为“征服者”，诺曼侵略者即指此人。

八

我于上篇，既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①，二、“资本集中说”^②。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的术语说^③，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工余值说”。

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 Sismondi^④、Saint - Simon^⑤、Proudhon^⑥、Rodbertus诸人^⑦，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马氏则不然，他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特别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力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易不能免的结果——一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平民都须服从的。

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氏说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 Ricardo 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³⁾，但他未能决然采用。马氏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象 Ricardo 的踌躇。

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用的价值而论，这的确是唯一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

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

工人的工力 (Labour force) 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 (指工力) 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 (Labour 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常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

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物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

产的一小部分。一时间的劳作，或一日的辛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持那个工人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无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金钱偿他的工值，都是代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价值多。

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 value）。

这样办去，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

(Surplus 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作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余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十二小时，这余工时间，自然可以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场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生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

协力 (Cooperation) 的影响所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用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若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完全失败了。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象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注释】

①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说。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起源、本质、产生和分配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

论的基石。马克思论证并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剩余价值是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

②资本集中说：由若干小资本合并成少数大资本的过程。是扩大单个资本总额的另一种形式。它不同于资本积累。资本集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由中小资本合并成大资本，使原有资本在各资本家之间重新组合，并不会增大社会资本的总额；资本集中的进展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它可以通过社会资本各个组成部分在分配上重新组合来实现，并能在短期内集中大量资本。

③孔德：生于1798年，卒于1857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但二人的观点根本不同。孔德认为哲学不应以抽象推理而应以“实证的事实”为依据，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或现象”，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构成的。其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主义入门》、《实证逻辑体系》等。

④Sismondi：即西斯蒙第（1773—1842），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又是经济浪漫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主要的著作有《论商业财富》、《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⑤Saint - Simon：即圣西门，见前释。

⑥Proudhon：即普鲁东，见前释。

⑦Rodbertus：即洛贝尔图斯（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著有《资本》一书，曾任宗教教育大臣。

⑧Ricardo：即李嘉图，见前释。

九

前节所述，是马氏“价值论”的要旨。而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率论”，也不可不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①，须先说一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工生产的价值中除去他的必要生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生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生，是单由于可变资本，不是由于资本全部。但因生产物品时支出的费用都出自资本（这些费用，马氏叫作费用价格），而于费用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样子。工力的价格就变成工银，工力生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用下列的论式表明这个道理：

1. 全资本 (C) 由不变资本 (c) 与可变资本 (v) 而成^②，
2. 可变资本生出余值 (m)，
3. 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 $\left(\frac{m}{v}\right)$ 叫作余值率，

用 m' 代他，

4. 因而得 $\frac{m}{v} = m'$ 的公式，

5. 又生 $m = m'v$ 的公式，

6. 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而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 (P)，

7. 余值对于全资本 (C) 的关系 $\left(\frac{m}{C}\right)$ 为利润率，用 P' 代他，

8. 从而得 $P' = \frac{m}{C} = \frac{m}{c+v}$ 的公式，

9. 若把 m 换成 $m'v$ 又得 $P' = m' \frac{v}{C} = m' \frac{v}{c+v}$ 的新公式，

10. 再把他换成比例式，断得 $P' : m' = v : c$ 的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又可断定利润率 (P') 常比余值率 (m') 小，因为可变资本 (v) 常比全资本 (C) 小 ($C = c + 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余值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率^③。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

行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一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下：

1. 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 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表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低。

3. 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下表：

C (全资本)	c (不变)	v (可变)	m' 余值率	m 余值	P' 利润率
100 = 80 + 20			100%	20	20%
100 = 70 + 30			100%	30	30%
100 = 60 + 40			100%	40	40%
100 = 85 + 15			100%	15	15%
100 = 95 + 5			100%	5	5%

而于实际，这五种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别。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比例以上的比例结合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卖。以平均以下的比例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马氏以下表说明这个道理：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资本结合比例	余值	已经消费的资本	商品的		商品卖价	利润率	价值与卖价的差
				价值	费用价格			
I	80c + 20v	20	50	90	70	92	22%	+ 2
II	70c + 30v	30	51	111	81	103	22%	- 8
III	60c + 40v	40	51	131	91	113	22%	- 18
IV	85c + 15v	15	40	70	55	77	22%	+ 7
V	95c + 5v	5	10	20	15	37	22%	+ 17

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一、

I 例	不变资本 80	可变资本 20	合计 100
II 例	不变资本 70	可变资本 30	合计 100
III 例	不变资本 60	可变资本 40	合计 100
IV 例	不变资本 85	可变资本 15	合计 100
V 例	不变资本 95	可变资本 5	合计 100

二、余值率 ($\frac{m}{v}$ 即 m') 依马氏的定理皆为同一。兹假定余值率为 100%，

三、那么

I 例，对于可变资本 20 其 100% 的余值为 20，

II 例，对于可变资本 30 其 100% 的余值为 30，

Ⅲ例，对于可变资本 40 其 100% 的余值为 40，

Ⅳ例，对于可变资本 15 其 100% 的余值为 15，

Ⅴ例，对于可变资本 5 其 100% 的余值为 5，

四、费用价格，即生产费，应该与恰足收回 (1) 可变资本的全部及 (2) 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二者的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假定 I 例为 50，Ⅱ 例为 51，Ⅲ 例为 51，Ⅳ 例为 40，Ⅴ 例为 10，

五、那么费用价格的额，应如下表：

	可变资本		消费资本额		费用价格
I	20	+	50	=	70
Ⅱ	30	+	51	=	81
Ⅲ	40	+	51	=	91
Ⅳ	15	+	40	=	55
Ⅴ	5	+	10	=	15

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 I $70 + 20 = 90$ Ⅱ $81 + 30 = 111$ Ⅲ $91 + 40 = 131$ Ⅳ $55 + 15 = 70$ Ⅴ $15 + 5 = 20$

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下表：

I	II	III	IV	V
90	111	131	70	20

八、而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而以对于平均结合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下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text{资本总额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500$$

$$\text{不变资本总额 } 80 + 70 + 60 + 85 + 95 = 390$$

$$\text{可变资本总额 } 20 + 30 + 40 + 15 + 5 = 110$$

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

$$\frac{390}{500} = 78\% \quad \frac{110}{500} = 22\%$$

$$\text{而余值总额为 } 20 + 30 + 40 + 15 + 5 = 110$$

$$\frac{110}{500} = 22\%$$

十、这 22% 就是对于平均结合比例 $78c + 22v = 100$ ，所生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十一、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begin{array}{llll} \text{I} & 70 + 22 = 92 & \text{II} & 81 + 22 = 103 & \text{III} & 91 \\ & + 22 = 113 & \text{IV} & 55 + 22 = 77 & \text{V} & 15 + 22 = 37 \end{array}$$

十二、随着资本结合的比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五个例的卖价与其价值的差额算出如下：

- 第一例，卖价比价值多二，
- 第二例，卖价比价值少八，
- 第三例，卖价比价值少十八，
- 第四例，卖价比价值多七，
- 第五例，卖价比价值多十七，

十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 $2 - 8 - 18 + 7 + 17 = 0$ ，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仍无二致。

这就是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

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

【注释】

①平均利润率：亦称一般利润率，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对社会总资本的比例。通过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不同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竞争，资本从利润低的部门转入利润高的部门，使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而形成。用公式表示：
$$\text{平均利润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总额}}{\text{社会总资本}} \times 100\%。$$

②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指的是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指的是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

③利润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剩余价值对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表示资本的增值程度。用公式表示：
$$\text{利润率} =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不变资本} + \text{可变资本}} \times 100\%。$$

十

马氏的余值说与人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不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生增殖的，惟有劳力。故惟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需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

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

的，只是他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能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与别的生产物全是一样。

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自存，不能自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用者的能力而异，全离开人格超越环围而行。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一万元的资本，用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一万元。这一万元因把他用于生产上生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自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一定普遍的率，决没有甲的一万元生一分利息，乙的一万元生二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在实际上，同是值一万元的资本，他的生产效程决不一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一万元的东西，而房屋与机器的生产效程不同。

同是用一万元买的机器，而甲机器与乙机器的生产效能各异。可是生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用，全是企业能力的关系，富于企业能力的去经营，所得的生产效果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入企业的利润。马氏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原故，全是因为自存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自存的资本，当然受一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生的。增殖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生这个剩余的力量。有这个力量的资本，只是那用作劳工生活维持料的资本。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自存就算满足，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生出这个的工人领受，要是反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工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

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惟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全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1）止于收回自己本来价值的，（2）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二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1）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2）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

(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分包含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十一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把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 system）下的工人^①，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

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 Trusts 与 Cartels 这些组织^②，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是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 Trusts 与 Cartels 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于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汗水，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

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命运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

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③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注释】

①基尔特制：基尔特意为行会，是封建社会城市中的同业组织。分为商业基尔特和手工业基尔特。封建社会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或手工业者为限制竞争，规定生产或业务范围，解决业主困难和保护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组成行会，带有封建垄断性质。

②Trusts 与 Cartels：Trusts，即托拉斯，见前释；Cartels，即卡特尔，原意协定或同盟。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生产同类产品的资本主义企业，为获得高额利润，在划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价格等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联合。

③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这句话出《淮南子·原道》中“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引申而来。其大意为：善于游泳的人往往淹死于水中，善于打仗的人往往死在兵器下。比喻人自以为有某种特殊本领，因此大意而惹祸。

李大钊评传

刘建国

李大钊，字守常，笔名孤松，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乐亭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南临渤海，东北隔滦河与昌黎相望，北界滦县，西与滦南县相邻。整个县境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号称“冀东粮仓”。李大钊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22岁就去世了，留下了怀着身孕的妻子。李大钊的母亲周氏（1865—1891）因伤感过度，在生下李大钊后不到16个月，也相继去逝。李大钊从小就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是年过六旬的祖父李如珍将他抚养成人。李如珍自己没有子嗣，李任荣是李如珍的过房儿子，且又早逝，留下了这个孙儿，李如珍倍加珍惜，为之付出了后半生的大部心血。

李如珍家庭比较富有，有近百亩土地，曾在东北吉林各地经商，在当地属于中上等人家。李

如珍考取过秀才，但他生活的时代，适逢中国近代史上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因而他那爱国、爱民、爱家乡的情感，深深影响了年幼的李大钊，爷爷成了李大钊最早的启蒙教师。孩提时代的李大钊自小就跟从爷爷识字并参加家务劳动，年幼的李大钊以才思敏捷而名闻乡里。

1895年，7岁的李大钊开始在本村私塾中读书，学习四书五经，老师为他起名“耆年”。那时，李大钊就因聪明善用功而深得老师的喜爱，老师单子鳌认为李大钊是他“平生最得意的学生”。1898年，李大钊又到赵家馆跟赵秀才读书，此后不久转到井家坨村的黄玉堂老师那里去读书。面对着当时洋人横行冀东以及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李大钊向老师问到：“为什么穷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问的老师也无从回答。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灵中就产生了对帝国主义和卖国的清政府的憎恨，特别是听到黄玉堂老师讲的洪秀全的故事，更为激动，决心在长大以后“要效法天王洪秀全”，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原址在卢龙县城，今唐山一中的前身），在这里，李大钊接触到了新的学问，资产阶级的启蒙科学、英语、康梁维新派的文章，使李大钊眼界大开，从此产

生了“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思想，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1907年，李大钊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仿日本法律学校体制，学制六年，在这里，李大钊系统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政治学说，比较广泛地了解到了新学。李大钊求学的这个时期，时值辛亥革命前后，他目睹了清朝的腐败和社会危机，参加了要求开国会、立宪法的请愿活动，并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之一，与白坚武、张泽民并称“北洋三杰”，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11年12月底，李大钊家乡的北邻爆发了辛亥滦州起义。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史地教师白雅雨，是辛亥滦州起义的领导者并在起义中英勇就义，白雅雨老师的壮烈义举，给了李大钊极大震动，促使李大钊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912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李大钊密切注视着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开始为新的共和国“隐忧”和“哀痛”。他说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共和国仍然是“以暴易暴，专袭至今。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我国民也”！

1913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时，

正值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之时。“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对这次革命抱着“巨大希望”的李大钊感到愤慨和痛心，由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日甚一日，李大钊暂回故乡，筹化到日本去留学。

1913年，李大钊得到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的支持，东渡日本求学，出国之前，他写下了抒发自己爱国情怀的诗句：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却后话，连天烽火独立君。

李大钊到日本后，在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留学期间，他时常与同学、友人讨论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并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内所没有的新知识。在日本学习期间，李大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接触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此时，他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战斗檄文，他的著作已从针砭时政进而转向尖锐抨击帝国主义

的侵略，揭露军阀的卖国行径。他参观日本的“游就馆”，馆内陈列着日本从我国东北掠去的物品，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并表示要“痛自振励”，“挽狂澜于即倒”。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他著有《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相勾结，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于这一年在日本成立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1916年5月，李大钊未等毕业，就回到祖国，投入到国内的反袁活动。从此，结束了留学生涯。

李大钊回国后，受汤化龙的邀请，从上海赴北京办报，8月份李大钊创办了《晨钟报》，但由于研究系政客的干扰，李大钊被迫辞职；1917年，李大钊受章士钊之请，参加《甲寅》日报的编辑，在回国办报的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排除种种阻力，发表了许多反对军阀，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体现了李大钊的爱国主义精神。

1918年2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的北大，是新思想新文化孕育成长的园地，也是新旧思想斗争相当激烈的地方。在这里，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继续搜集各国革命运动的材料，特别是俄罗斯革命，

他尤为关注。1918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研究会，建立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型图书馆“亢慕义斋”。李大钊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块阵地，深入研究十月革命，这年7月，他在《言治》杂志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分析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异同及其性质，阐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同年11月，他在今中山公园里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12月，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进一步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预言“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逐渐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是五四运动的主将。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大钊就已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并在《每周评论》上撰写文章，号召爱国青年同封建军阀做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这一切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积极参与并指导运动。他参加了学生的游行示威，当北洋政府大批逮捕学生时，他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一系列活动，当蔡元培为抗议北洋政府下令逮捕学生而辞职时，李大钊等人代表全校员工到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元培校长。此外，李大钊还通过《每周评论》和创办《五七》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就是其中的一篇非常有力的战斗檄文。李大钊在文章中告诉人们，绝对不能对帝国主义抱任何幻想，“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做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到了胜利”；但是“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没有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这些名辞，都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他进一步指出：“不止夺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本着“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

李大钊写的这篇《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促使中国人民在这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强盗的面目，促使五四运动深入发展并形成了高潮。在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时，李大钊四处设法营救。在6月28日巴黎和会签约

的时刻，李大钊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对签约的斗争。在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这胜利包含着李大钊的丰功伟绩。

五四运动胜利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发展，人们热切地探寻新的真理。李大钊在这一时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9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为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自俄国革命以来，“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李大钊第一次在中国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指出了三者的关系“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不久，李大钊陆续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继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李大钊全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时，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极力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企图以此来阻挠革命运动的开展。李大钊看透了胡适的真实目地，在家乡的五峰山中，写了驳斥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在文章中

阐明了“问题”和“主义”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李大钊在这场“问题”和“主义”之争中，坚决果断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有力地回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一步向中国人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积极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逐渐汇聚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等。1920年初，李大钊就曾同邓中夏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经天津赴上海的途中，二人商讨了建党的问题。陈独秀走后，李大钊设法在天津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了联系。3月共产国际的代表威金斯基来华，李大钊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再次讨论了建党问题。经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又去上海会晤陈独秀。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北京建立了共产党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

1921年6月，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商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派张国涛赴上海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商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李大

钊因工作繁忙，没有亲身参加“一大”。但他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一大”的召开。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卓越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认真贯彻党的工作方针，长期在北方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创办了《工人周刊》，介绍国外消息，启发工人觉悟，对全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李大钊还派人深入到唐山、长辛店工人中间进行讲演，了解工人情况，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922年8月，他派邓中夏组织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0月份李大钊的家乡唐山爆发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李大钊为发动这次罢工、支持这次罢工和处理善后事宜做了大量的工作。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抗议军阀吴佩孚阻挠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李大钊对这次罢工极为关心，多次会见罢工领导人陈潭秋、施洋等人；在“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

钊尽全力做善后工作，号召“我们后死者，要继承先烈精神打倒军阀并帝国主义”。正是李大钊的大量工作，推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李大钊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又十分关注农民，深入京郊菜农支持他们的抗捐斗争，亲自培训农民干部或送他们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回来后派到北方农村去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农民运动迅速展开。

李大钊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执行者、策划者。1922年8月中共召开西湖会议时，李大钊曾在会前同孙中山面谈，向孙中山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会上李大钊积极支持共产国际代表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并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会议得以顺利开展。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23年6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力主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大会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李大钊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大钊同孙中山进行了真诚的合作，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3年11月在广州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

言》。年底，又邀请李大钊帮助他完成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以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和各项进程，在会上击败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破坏国共合作的挑战。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国民党“一大”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及党章，使国民党“一大”成为国共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

国共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李大钊回到北京，建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利用国民党这面旗帜，进行了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这段时间内，他迎接孙中山北上，推进国民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气焰，巩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4年6月，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同年回国后投入到了火热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1925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总负责，为了便于工作的展开，李大钊辞去了几个大学的职位，全身心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他和北方区委领导了整个北方——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南到直隶、山西，北到内蒙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他坚持在

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北京，从事艰苦卓绝的工作，作为区委书记，日夜操劳谋划，在复杂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了北方革命工作。这一阶段，他亲自领导了北方的“召开国民会议”、“五卅”、“关税自主”、“三一八”等多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给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打击。在农村，1926年北方各省的农会组织迅猛发展，农会会员激增。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发展壮大，1926年7月，北方区委有党员2000多人。这一切都显示了李大钊的领导才能，李大钊是北方革命运动真正的领袖。

李大钊在北方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政府，也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恐惧。段祺瑞的“执政府”对李大钊等加以“假借共产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段祺瑞下台后，占领京津的直奉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迫害革命人士，“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视为眼中钉，一再被通缉。李大钊在恶劣的环境下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不计个人安危，毅然将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肩负起来。他既是共产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人，又兼任国民党北方的重要领导人，以大无畏

的精神，投入到秘密工作中去。随着环境日趋恶化，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的机关迁入苏联驻华使馆西院的兵营中，继续坚持斗争。1926年7月，广东革命军誓师北伐，随着北伐军向北挺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猛烈地发展起来。同年9月，冯玉祥在内蒙五原誓师，响应南方革命。做为北方革命领导人的李大钊，派遣与输送了大批干部到南方，同时派遣了许多同志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帮助冯玉祥的部队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由于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坚强领导，北方革命群众的斗争虽然处在恶劣环境下，但仍然逐步向前发展。

由于奉系军阀加紧对北方革命指挥机关的监督与破坏，李大钊的处境日益险恶。1927年4月6日，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宪兵特务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实行了疯狂的大逮捕，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在狱中，敌人对李大钊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企图从李大钊口中得到党的机密，但李大钊坚贞不屈，始终坚持斗争，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束手无策的奉系军阀不顾舆论的反对，于4月27日将李大钊处死在西郊民巷看守所。

李大钊在临刑前，面对绞刑架，“神色未变”，

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象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昏脑的来演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李大钊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38岁。

李大钊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李大钊除了在革命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外，他在史学、教育、文学方面也卓有成就，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李大钊在历史学上造诣很深，他著有《史学要论》、《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清朝通史序》、《史观》等著作。李大钊是历史学革命的先驱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全面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李大钊曾在北京的一些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学要论”、“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并先后写出了一系列史学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并对许多历史问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题发表了许多非常有见解的意见。如他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规律做了崭新的解释。他认为史论、通鉴一类的古籍、文献并不是真正的史书，而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应重视和运用的史料。又如李大钊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改作”、“重作”。诸此等等，均已表明李大钊已经在中国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虽然因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屠杀而英年早逝，未能亲自实践他对历史“改作”的具体主张，但他仍不失为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李大钊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对教育的性质、任务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他在对农民、工人的教育中，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施教。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针对袁世凯专权复辟、倒行逆施的卖国活动口诛笔伐，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教育人们认清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教育。十月革命爆发至牺牲前这段时间里，他在群众中，特别是对青年，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教育工作。《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120篇文章，成为最感人的教育材料。他用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乐观

主义的教育，给人们指出了革命方向，从而对五四运动在思想上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和指导作用。1916年，他写的《青春》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表达了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歌颂了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在文中说：青年应该以栽培、灌溉、促进并同享宇宙之青春为自己一生的目的，在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衰老者复为青春，青春者终不衰老，从而“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在这篇文章中，号召人们起来冲破历史的网罗，与传统的旧思想决裂。《青春》一文，成为青年运动的指路明灯。

李大钊在对农民、工人的教育中，民主、平等和自我觉悟始终是其主体思想。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李大钊经常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教育他们、启发他们，使他们的觉悟不断提高。他的《土地与农民》、《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局势》、《归国工人》、《劳动问题的祸源》等几十篇文章，是研究工农、施教工农的材料见证。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李大钊在诗歌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是我党早期高层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在他短暂的38年人生中，写下了许多诗篇。这些诗篇中，有旧体诗和新体诗两种。李大钊的旧体诗共18首，创作于1913—1918年，在这些旧体诗中，映示着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爱国激情。1919年冬，李大钊发表了一首游颐和园诗：

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仅仅四句，已经饱含了作者对统治阶级的无比痛恨，对广大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

1913年4月，李大钊创作了《晚岁寄友》。他在这首诗中写道：

几载不相见，沧桑又一时。
廿年余壮志，千里寄新诗。
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
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

这首《晚岁寄友》诗，表这了他反对清朝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壮志和高度的爱

国主义激情。此外，李大钊的《神州风雨楼》等诗篇，无不洋溢着忧国忧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感情。

李大钊的新体诗，将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19年9月，他在《岭上的羊》中写道：

我在古寺门前站立，
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
看啊，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
一个个都爬上山去。
羊啊！我细听你的声音里，
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
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
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
天天只傍着那水，
吃些草和叶子；
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
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
我不怕你，而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

这首诗既写出了牧羊的景色，也表达了作者对受尽欺凌的弱小生灵的深切同情，将艺术性和思想

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19年李大钊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这首新体诗虽然没有直接写景，但它将作者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蔑视反动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表达了作者坚强的革命信念。

李大钊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那英雄业绩、坚贞的革命精神却永垂不朽。他的高尚品德，更为人们所敬仰。在李大钊被捕前夕，许多朋友都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夫人赵纫兰劝他走时，他更是苦口婆心，一直说得夫人闭口无言，才不说下去。李大钊被捕后，北方的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设想，并组织了劫狱队。这个消息传到李大钊那里后，李大钊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戴，但反对这个计划。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这种不怕牺牲，公而忘私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大家，激励了同志们继续斗争的信念。

李大钊身为北京大学教授，但生活却极为简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常年不乘洋车”。李大钊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极为严格，

他的孩子们也同李大钊一样，“子女服朴实”。李大钊和自己的家人如此含辛茹苦，但对别人、对革命却非常慷慨。他的月薪120元，除了用30至50元维持家中的生计外，其余的全部用于接济贫苦的学生和支援革命活动。有时家中因此而断炊，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于每月发薪水时，事先关照会计，先将他家的生活费扣下交给赵夫人，以免出现“无米之忧”。1925年，李大钊去张家口参加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在工人宿舍里和许多工人一同睡在铺干草的地上。这种谦逊朴实的作风，这种高尚的人格，团结了各界人士，为革命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3年9月为李大钊撰写的碑文对他的一生做了恰如其分的总结：“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展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这是对李大钊光辉的一生所做出的定论，也是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

